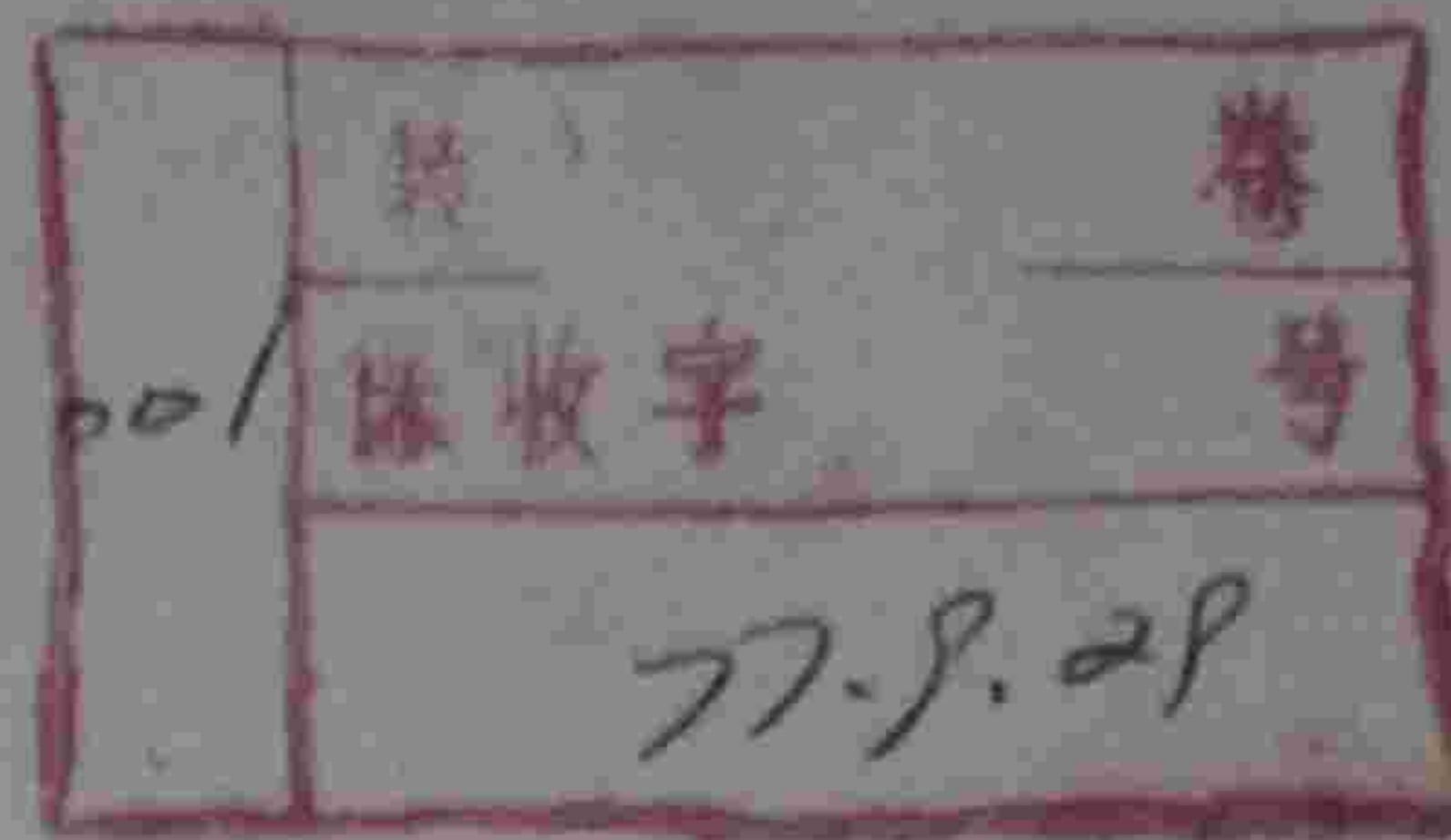


编 号 0076916



黄兆其的部分罪行材料

朱、黄 专 案 组

一九七七年七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黄兆其是“四人帮”在我省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头目.....	(1)
一、黄兆其是指名“突击”入党的.....	(2)
二、野心勃勃，一心想当“云南王”	(3)
三、说假话，耍两面派，欺骗毛主席、党中央...	(4)
四、拉帮结伙，是个“地头蛇”	(7)
第二部分 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	(11)
一、千方百计向“四人帮”挂勾，领取黑旨意.....	(12)
二、大量翻印散发“四人帮”及其余党的黑讲话、反动大字报.....	(20)
三、倾巢出动，反革命叫嚷甚嚣尘上.....	(21)
四、利用文艺进行反党，炮制毒草作品.....	(27)
第三部分 对抗中央〔1976〕四、五号文件，疯狂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	(29)
一、破坏地书会议，刮起改组省委的黑风恶浪.....	(30)

第一部分

黄兆其是“四人帮”

在我省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头目

长期以来，黄兆其野心勃勃，唯权是夺，一心想当“云南王”。文化大革命中，他钻进一个群众组织并当上头头。他积极推行林彪反党集团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分裂群众、分裂军队、分裂党。他乔装打扮，欺世盗名，当上了省革委副主任，被突击入党，是窃取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政治扒手。他追随“四人帮”搞“三箭齐发”，反党乱军，拉帮结伙，大搞“复辟势力”，破坏批林批孔运动。他同朱克家、刘殷农等狼狈为奸，抱成一团，苦心经营帮派势力，成为“四人帮”在我省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头目，疯狂地对抗毛主席、华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妄图把云南变成他们的“帮天下”。

二、控制理论讨论会议，煽动层层夺权………	(32)
三、胁迫和伙同前省委主要负责人炮制省委四十号文件，披上合法外衣进行篡党夺权………	(34)
四、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之后，配合“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	(37)
五、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图谋乱中夺权…	(45)
第四部分 强行释放在押罪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48)
一、威逼省、市委释放在押的现行反革命、流氓罪犯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	(49)
二、强迫省委和昆明铁路局党委释放铁路局在押的十三名罪犯………	(53)
三、在全省刮起了一股释放在押罪犯的黑风…	(56)
第五部分 “四人帮”被粉碎后，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负隅顽抗，进行垂死挣扎……	(60)
一、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一次黑会……	(62)
二、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串连活动……	(64)
三、着手准备枪枝弹药和其它物资………	(65)
四、改变反革命策略，转移揭批“四人帮”斗争大方向………	(69)
五、拼凑帮派的第二套班子，妄图潜伏下来，伺机再起………	(71)

一、黄兆其是指名“突击”入党的

下面是王盛录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一九六九年，我是工学院机械系临时党支部书记。九月，支部确定发展、培养党员对象时，均未提到黄兆其。十月三十一日下午，由原省政工组某负责人带黄兆其到我系指名讨论黄兆其入党。在这之前，黄兆其本人没有向我们支部提出入党申请，我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指定的，我没有同黄谈过话，对黄兆其的家庭情况和他父亲自杀问题，我们支部也没有调查过。黄兆其“突击”入党以后，很长时间没交一次党费，没过一次组织生活。

下面是赵家才、袁子荣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一九六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黄兆其和原省政工组某负责人来到我院，他们对我们党支部搞了个突然袭击，那位省政工组的负责人说：“黄兆其要求入党，应该在你们支部讨论，我作为他的一个介绍人”（另一个介绍人王盛录同志也是临时指定的）。随即，那个负责人就拿出了早已填好的黄兆其入党志愿书。这个志愿书不是支部发给他的。在支部讨论前，黄没有向临时支部提出过入党申请；支委未进行过研究；对其家庭情况、父亲自杀以及社会关系未作过任何调查。那个负责同志在支部会上说：“黄兆其家庭历史问题由我们负责，你们主要讨论现实表现就行了”。这样，黄兆其被指名“突击”入了党。黄兆其入党后，整整八个月时间，没有参加

过一次组织生活，没有交过一次党费。

注：赵家才同志是当时临时党支部的组织委员

二、野心勃勃，一心想当“云南王”

下面是沈志达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一九七〇年五月的一天，黄兆其亲自对我和另一个同志讲：“我与刘殷农去找周兴同志谈话，向周兴同志说，你已经六十五岁了，没几年了，应该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周兴同志听到这里，发了脾气说，你们是不是巴不得我早死？！”

下面是黄兆其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云南省委写的检查（节录）

在去年的串连会上，我说过：“云南的造反派头头就是窝囊，连个九大代表、十大代表也没有，省委常委也没有，我的职务算最高，也只是参加常委工作”。我思想深处是对没有当上“十大”代表不满，对现状不满。

下面是荆文雄、王天华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一九七五年在贯彻省委〔1975〕二十六号文件时，我们从外调中发现，一九七四年六月底七月初，我厂帮派头目吴国林由浙江出差回来后，向徐宝兴、张奎林等人介绍浙江搞篡党夺权的情况说：“浙江解决造反派的问题步子迈得大，翁森鹤是造反派的头，已补为省委副书记，纳新提干很理想”。这个帮派头目还带回一份所谓

“关于上海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经验介绍”材料。七四
年七月底，黄兆其、刘殷农、李树林、张奎林、徐宝兴、谈子文、
许少先、李连生等人，在西山华亭寺召开黑会，策划篡党夺权。会
上，由徐宝兴、张奎林介绍了浙江、上海的“经验”，他们如获至
宝，议论说，我们云南造反派的问题就没有很好解决，还得要斗，
斗出个局面来，无论如何要把老黄（黄兆其）斗到省委书记班子中
去，把老刘（刘殷农）斗到市委书记班子中去。上面的问题解决
了，有了样板，下面的问题才好解决。

三、说假话，耍两面派，欺骗毛主席、党中央

由于黄兆其在批林批孔中，追随“四人帮”搞“三箭齐发”，反党乱军，拉帮结伙，大揪“复辟势力”，犯下了严重罪行，党中央为了教育挽救他，曾于一九七五年调他到北京等地学习近十个月。学习结束时，他向毛主席、党中央表示决心说：“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做到向毛主席、党中央怎么保证的，回去怎么做，决不当两面派”。但时隔不久，他又和朱克家、刘殷农等人勾结起来，大搞结帮篡党活动，充分说明黄兆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两面派。

而回憶時，高中生反而比初中生更愛追憶。這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沒有到大學念書的高中生對大學生活充滿嚮往，希望大學能像高中一樣；二、高中時已經習慣了老師的管束，到了大學之後，這種管束不復存在，學生自己卻沒有適應大學生活的能力，於是只能在回憶中尋找安全感。這就是學生對大學生活不滿的原因。

“五·一”劳动节的三·八妇女节，把三月八日的活动时间推后至三月八日。女川是三月关于家庭、社会的指代词语，代表女性。这个节日之意义在于洋溢着女性的关怀和爱意，充满女性的柔美与浪漫，充满女性的智慧与力量，是女性的节日，也是全人类的节日。

3. 而主之尊，竟生於外。而自己置土石於他山以自之。②
遂令先知造爲上事，而後在平陽縣竟十兵師之軍。③
則竟子之子也。不亦古之君子之風乎。中國之士人之子也。
而其子之子也。不亦古之君子之風乎。而今之士人之子也。
而其子之子也。不亦古之君子之風乎。而今之士人之子也。
而其子之子也。不亦古之君子之風乎。而今之士人之子也。
而其子之子也。不亦古之君子之風乎。而今之士人之子也。
而其子之子也。不亦古之君子之風乎。而今之士人之子也。

4. 2017-2018 学年上学期高一数学期中考试卷

群众批评的途径，对小道消息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要通过本单位、本部门、本系统的新闻媒介，给予适当报道，同时要深刻地分析问题，指出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把道理讲得通，讲得透彻，讲得深入，讲得具体，讲得生动，讲得形象，讲得有说服力，讲得有感染力。

以上是當時傳播的教育方案，這些內容都是和社會的進步相連的。
然而，有著這樣的文章，卻被認為是之。

卷之三

三

— 10 —

影印件原文

我向毛主席、党中央，向省委和全省人民表示以下决心：

1、认真刻苦地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各项指示。当前，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等三项重要指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给中央的《报告》，带头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把资产阶级派性批臭，把资产阶级派性输光，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2、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把立足点真正转到为人民服务上来，要以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为指针，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大讲路线，大讲党性，大讲大局，大讲团结，大讲纪律。认真检查，坚决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带头斗私批修，承担责任，拆墙填沟，搞好革命团结，做到向毛主席、党中央怎么保证的，回去怎么做，决不当两面派。

3、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自觉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把自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加强无产阶级党性锻炼，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向小冬子学习，做党的人，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处处以党员五个必须做到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

4、决心沿着毛主席给我们青年一代指引的方向，走一辈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到工农群众中锻炼自己，刻苦改造世界观。加倍努力，积极工作，大干社会主义，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决心把失掉的时间抢回来，把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云南的大好形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完成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奋斗。

以上是我对错误的初步检查，渴望中央首长和省委领导帮助、教育。有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云南省赴京汇报会议代表

黄兆其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四、拉帮结伙，是个“地头蛇”

黄兆其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长期以来，拉帮结伙，纠集帮派势力。在“四人帮”培植下，逐步组成了一个以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为头目的，政治上、组织上完全从属于“四人帮”的，以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是一个反革命地下独立王国。他们上与“四人帮”及其黑据点直接联系，下与一些部门和地区的帮派势力串通一气，并和军内的少数帮派头目勾结在一起。他们有头目，有高参，有核心人物，有基本骨干；有搞反革命舆论的文班子，有搞打、砸、抢的武班子；有情报联络组织，有秘密活动据点。他们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干了大量坏事，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下面是钱鑫、石宝忠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一九六九年底，黄兆其窜到昆明工学院采选系在昆钢实习的住地，亲自召开采选系支委会布置说：“省里有指示，要尽快发展造反派入党”。并指名六个人要采选系支部负责解决他们的入党问题。会后，在当时的整党小组组长（非党员）的操纵下，立即召开支委扩大会议，讨论贯彻黄兆其的“指示”。当时，不少党员提出：“这些人有的已离校两年多，有的家庭和本人政治历史都未经审查，不应匆忙发展”。黄兆其知道后，又跑到采选系在昆钢实习的住地，向党员施加压力。接着以通知党员过组织生活为名，对党员搞突然袭击，那个非党员的整党小组组长破口大骂：“我们给你们恢复了组织生活，你们反而来卡我们造反派入党，你们对造反派是什么

感情？我们造反派不入党，谁入党？”在这种情况下，黄兆其点名的六个人都突击入了党。这些人当中，有的直系亲属政历问题没有审查过，有的谎报家庭成份，有的把乱搞男女关系的检举材料从档案里抽走，有的一边讨论入党一边打电话询问情况，没等回话就通案里抽走，有的一边讨论入党一边打电话询问情况，没等回话就通过入党。还有一个和个别支委搞政治交易，代填志愿书、讨论时本人未到会就拉入党。这些人被拉入党后，黄兆其又利用他的权力和地位，强行把他们分配到省级机关和东川市的要害部门，扩大他的帮派势力。

下面是邓玉元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批林批孔运动中，黄兆其成立了一个以他和刘殷农为首的，张奎林、李树林、杜晨光、许少先、徐宝兴、涂晓雷等为核心骨干的秘密组织，设有舆论班子，情报机构，还搞了“四大”主力部队。他们按照“四人帮”的旨意大搞“三箭齐发”，大揪“复辟势力”，妄图打倒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他们经常在刘殷农家、市百货大楼、原省革委第一学习班等地进行阴谋活动。每当这个组织的核心会议做出决定后，由核心成员分头召集省委机关、省级各部、委、办、局，大型厂矿和昆明市的帮派头目传达布置，各地区是通过散发材料或是由地区帮派联络员来昆联系，协调行动。对外用笔名写文章，文章是由黄兆其、刘殷农定题目，核心骨干拟提纲，大多是由我执笔的。文章的主要内容：一、反对和抵制中央关于解决我省一系列问题的指示；二、大抓复辟势力；三、煽动派性。

下面是张学英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黄兆其对张奎林、徐宝兴一伙说，省建是“小上海”，“是造

反派力量强的地方”，要出“经验”，出“人材”，“支援其他地方”，“影响全省”。把省建当作他们资产阶级帮派势力大闹全省的“基地”。

从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张奎林、徐宝兴一伙就在省建机关设立了帮派指挥所资料室，专用电话，专用车辆，成立了造反革命舆论的文班子和搞打、砸、抢的“武斗队”，配备了参谋和联络员，并同省属二十个部、委、办、局，十个地、州、市，昆明市属五个局，昆明地区十七个大、中型厂矿的帮派头目以及军内的帮派骨干建立了定期和不定期的联系，有计划、有预谋地进行捣乱破坏。一九七六年他们又建立、健全了帮派指挥机构，工作班子和情报系统等。在他们内部形成了一整套“帮规帮法”，他们不称呼帮派头目窃据的党政职务，只叫“司令”，对帮伙不称同志，只叫“兄弟”。帮派成立吃“开张饭”，帮派周年吃“纪念饭”，帮派头目调动工作吃“饯行饭”，回到原单位喝“接风酒”，官复原职吃“胜利饭”，帮派骨干之间的矛盾弥合后，还吃什么“团结饭”、“感情饭”，等等。

在省建，他们的基本骨干中，本人有重大历史问题的占百分之二十七，直系亲属被杀、关、管，本人坚持反动立场的占百分之三十二，属于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的占百分之三十。

下面是朱克家的交代（节录）

对黄兆其他们，自从我认识黄之后，就倾向了他，我知道他们这股势力很大，我要在云南站住脚，就必须投靠他们。七五年他们是“挨整”的，这次他们一定要起来。共同的野心和立场使我和他们站在一起，我要支持、依靠他们，使他们也支持拥护自己，他们也会提名我进省委当副书记。

下面是刘殷农的交代（节录）

在“四人帮”的唆使下，以黄兆其和我为首，张奎林、徐宝兴、沈炳章、涂晓雷六人，在党内结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我们六人之所以能够纠合在一起，根本的思想基础都是为一己一帮谋私利，都是为了篡党夺权。名单是黄兆其定的，会议由黄兆其主持，由黄拍板，确定方针、任务。黄兆其作帮派的头，暗中和“四人帮”在云南的亲信朱克家紧密勾结，指挥我们紧跟“四人帮”干了大量“三搞一篡”的坏事。帮派内部大体有个分工，涂晓雷实际是黄兆其的代言人，张、徐主要负责对下的联络。我们怎样指挥呢？第一、黄兆其和涂晓雷单独研究，由涂晓雷执笔抛出大字报，用舆论指挥；第二、各人依靠本单位的帮派，指挥本单位；第三、通过本单位影响和左右一个系统；第四、通过一个工厂影响和左右一片；第五、黄直接指挥（如省级机关）或由我们直接出面指挥。

我还在昆明市搞了一个帮派，按省里大帮派的意图进行活动。

第二部分

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 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

黄兆其削尖脑袋，向“四人帮”那里紧跟、紧靠、紧钻。他通过多种渠道，向“四人帮”送黑材料，领取黑旨意。他舞文弄墨，写黑文章，发表反党讲话，积极鼓吹和发挥“四人帮”的反动“帮理”，并通过御用的“文班子”，以“秦臻”、“姚雨”为喉舌，连篇累牍地炮制反动大字报，为他们在云南建立“帮天下”制造“理论根据”。他们还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党，炮制了《反击》式的话剧《典型报告》、《搏斗》等一批大毒草。帮派骨干也倾巢出动，上呼下应，发动反革命舆论攻势，搞乱了思想，搞乱了理论，进而搞乱一切，以便乱中夺权。

一、千方百计向“四人帮”挂勾，领取黑旨意

黄兆其不仅通过朱克家这条“通天线”，而且还亲自给王洪文打小报告，派心腹到“四人帮”的黑据点挂勾，利用张健农在“初澜”写作班子的公开身份当联络员，以及与“四人帮”派来的“记者”密谈等，向“四人帮”送黑材料，领取黑旨意。

1. 按“四人帮”的黑旨意，与朱克家密谋策划另搞一套

一九七六年二月，朱克家参加中央第二次打招呼会议回到昆明后，黄兆其急忙找朱克家密谈。朱克家向他交了“四人帮”另搞一套的“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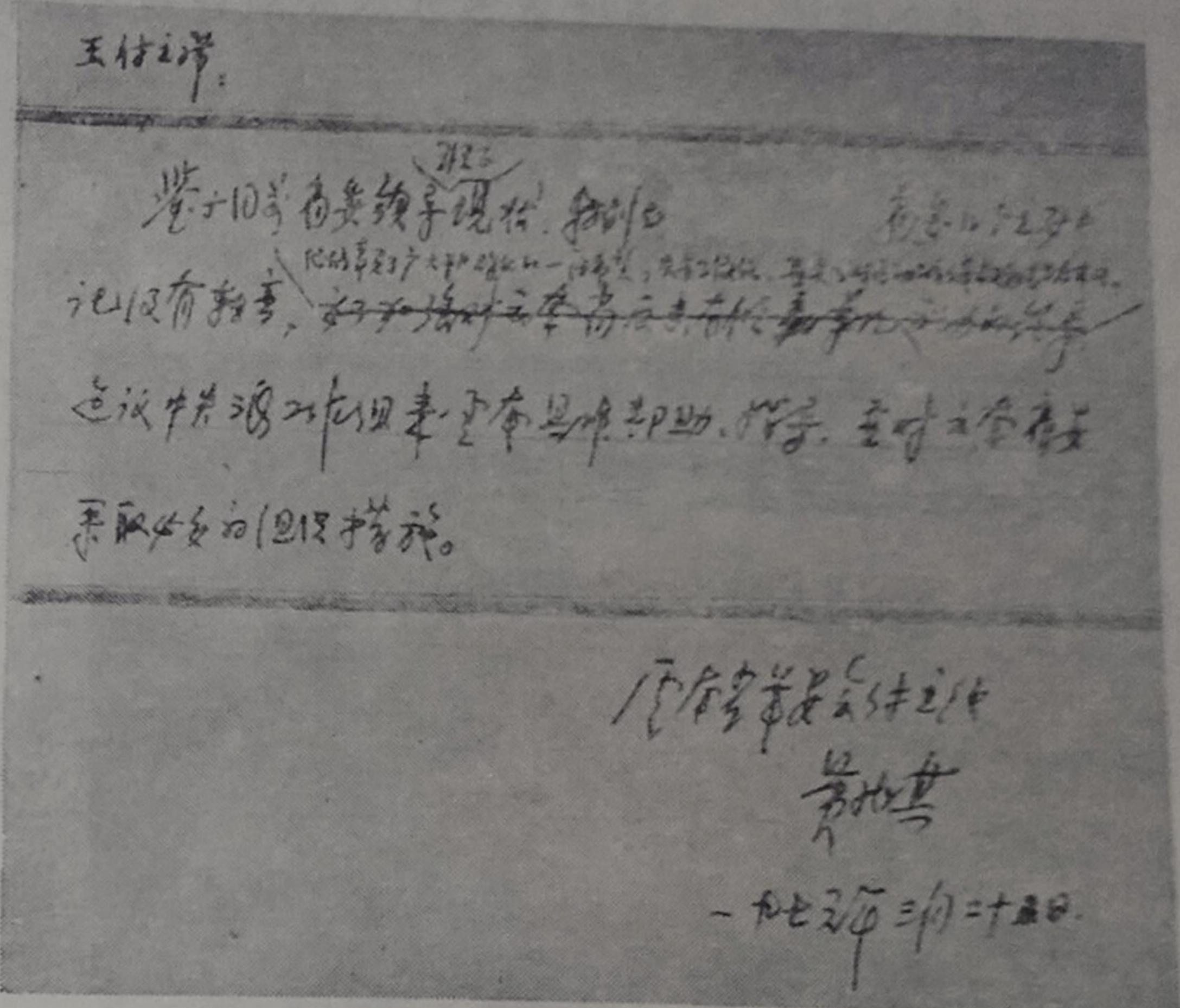
下面是朱克家的交代（节录）

我参加了中央打招呼会议，在会上我领受了王洪文、江青的旨意，一回来就把全部内容透给了黄兆其，特别是王洪文的讲话、江青的讲话。我同他重点说了这几个问题：

①云南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②要集中力量攻省委，揭开盖子，狠狠的批；③要支持贾的工作，打另外几个书记；④注意不要形成两派。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和意见，并说，我们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这次要斗。

2. 给主子王洪文打小报告，告省委和昆明军区主要领导同志的黑状

去年，黄兆其连续多次给王洪文打小报告，告黑状。仅三月二十五日到四月中旬，就给王洪文打了三个小报告。



左面是查获黄兆其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给王洪文打的一个小报告的底稿（节录）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王副主席：

鉴于目前省委领导班子现状，特别是省委几个主要书记没有转弯，他们辜负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再希望，失去了信任，丧失了对运动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建议中央派工作组来云南具体帮助、指导，并对云南省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

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 黄兆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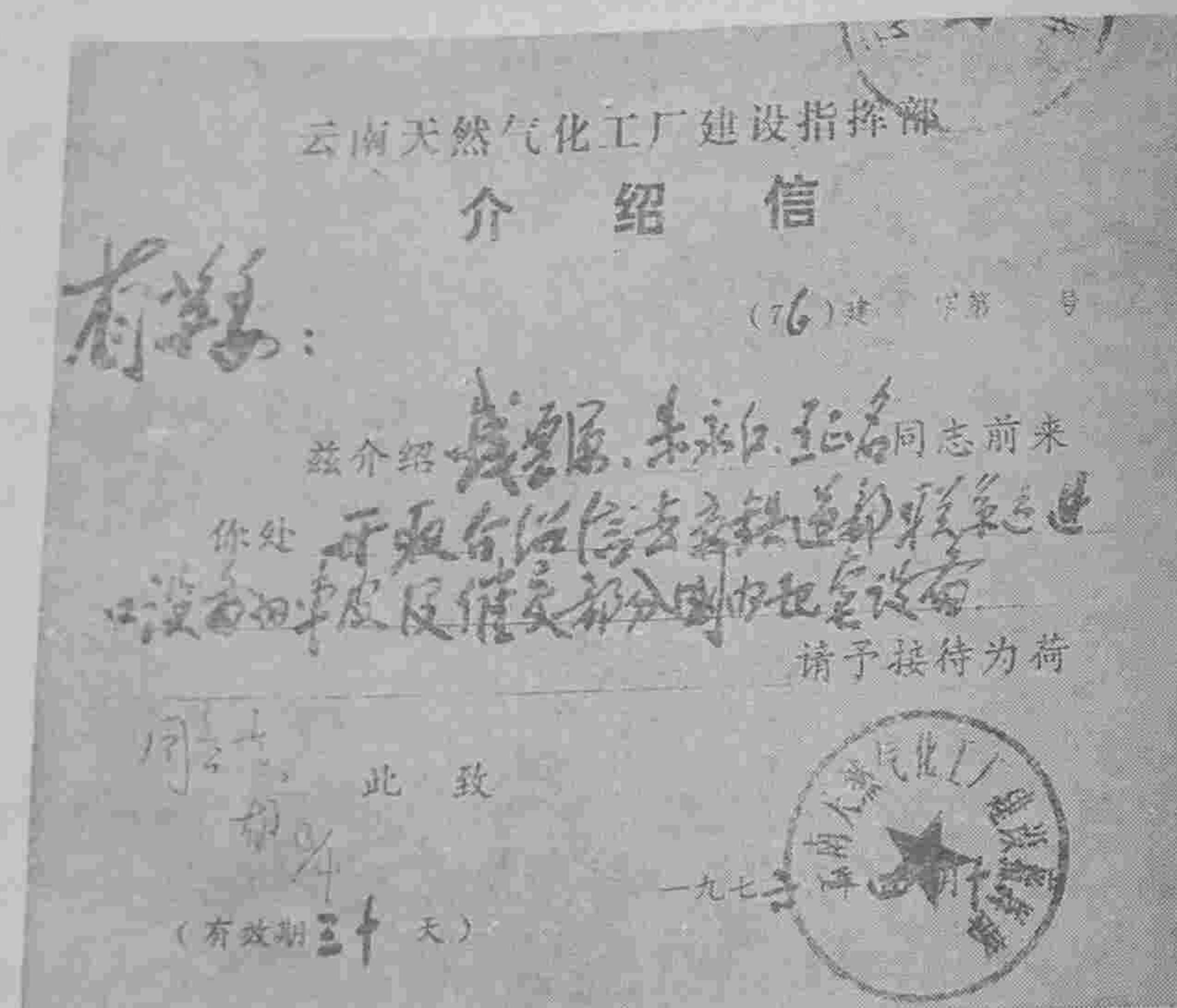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3. 派心腹上北京，直接与“四人帮”的黑据点挂勾搭线

一九七六年四月，黄兆其指派涂晓雷、沈炳章、包亚芳和钱厚

源上北京，向“四人帮”送黑材料，告黑状。他还指使钱厚源与云天化驻昆办事处的邱××密商，以出差为名，用化名为沈炳章、涂晓雷上北京办了云天化的介绍信。又通过省委办公厅胡延观非法办了去北京的省革委会介绍信。

下面是这两份介绍信原件的影印件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介绍信存根									
被介绍人单 位	云天化建设指挥部	姓名	钱厚源	朱永红	王正名	人 数	叁		
去何处	铁道部	批准机关或准许人	胡延观	批 准 机 关 或 准 许 人					
事由	联系工作								
填发日期	1976年4月13日	有效期	1976年5月12日	编号	0601				

影印件原文

云南天然气化工厂建设指挥部

介绍信

省革委：

(76)建字第692号

兹介绍钱厚源、朱永红、王正名同志前来你处开取介绍信去京铁道部联系运进口设备的车皮及催交部分国内配套设备请予接待为荷

同意去。此致

胡13/4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日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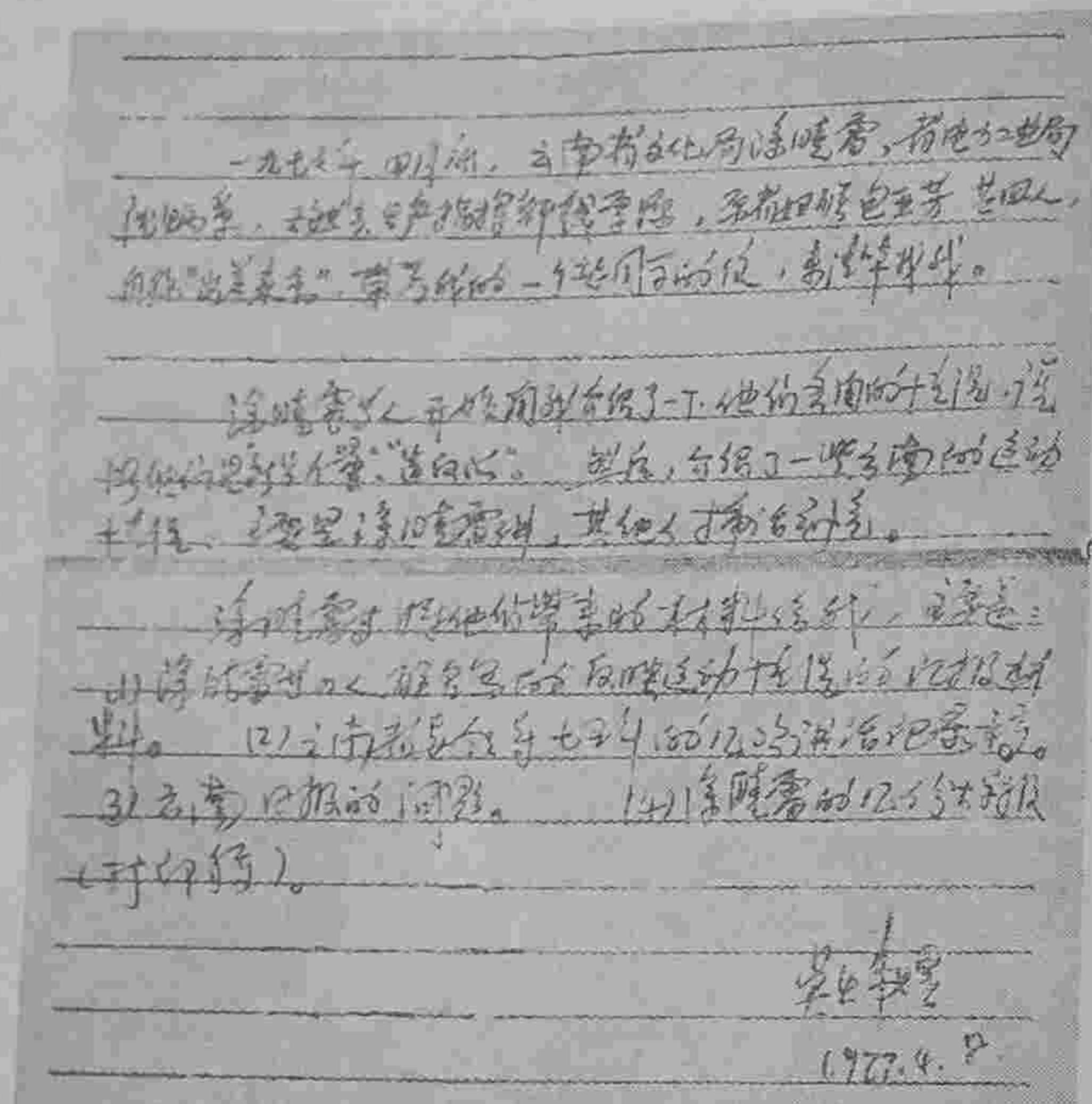
(有效期三十天)

注：朱永红是沈炳章的化名，王正名是涂晓雷的化名。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介绍信存根

被介绍人单 位	云天化建设指挥部	姓名	钱厚源	朱永红	王正名	人 数	叁
去何处	铁道部	批准机关或准许人	胡延观	批 准 机 关 或 准 许 人			
事由	联系工作						
填发日期	1976年4月13日	有效期	1976年5月12日	编号	0601		

下面是原清华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吴煌煜的交代材料原件
(节录) 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四月底，云南省文化局涂晓雷，省电力工业局沈炳章，天然气生产指挥部钱厚源，原省妇联包亚芳共四人，自称“出差来京”，带着我的一个老同学（注：即梅期东）的信，来清华找我。

涂晓雷等人开始自我介绍了一下他们各自的情况。说明他们是“新生力量”、“造反派”。然后，介绍了一些云南的运动情况。主要是涂晓雷讲，其他人插话补充。

涂晓雷等将他们带来的材料给我，主要是：（1）涂晓雷等四人联名写的反映运动情况的汇报材料。（2）云南省委领导七五年的几次讲话记录稿。（3）云南日报的问题。（4）涂晓雷的几份大字报（打印稿）。

吴 煌 煜

1977.4.8.

4、通过张健农在北京与“四人帮”黑据点频繁联系

下面是张健农的揭发交代（节录）

七六年，“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指名借调我到北京“初澜”写作组工作。朱黄刘帮派约我充当联络员。

（一）通过我与“四人帮”黑据点挂勾搭线。

沈炳章、包亚芳、涂晓雷、钱厚源到北京后，我叫他们到清华大学政治部找吴煌煜。林敬荣到北京，要找吴煌煜，是我亲自打电话同吴联系之后林才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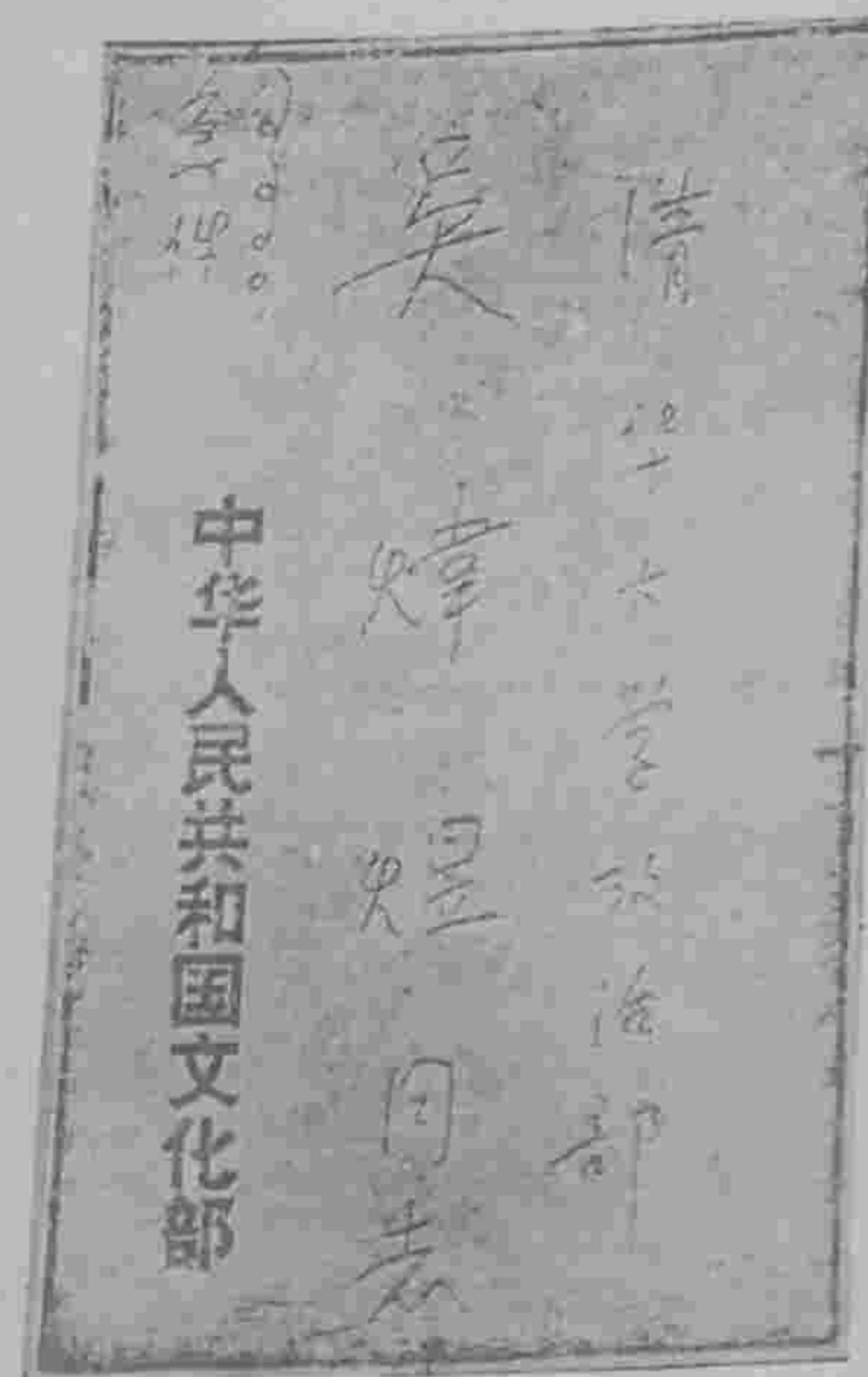
（二）向“四人帮”报送大批黑材料，提供云南情报。

七六年三月到七月，朱黄刘及其心腹通过我转送了六次黑材料，共四十多份。由我利用文化部递送公文的渠道，报送给“四人帮”。

（三）通风报信，传回“四人帮”一些黑旨意。

我传回的有：一、于会泳心腹谈“中央”需要了解各地情况，对云南情况很注意；二、张春桥关于文艺要写同走资派斗争黑指示精神；三、于会泳谈“中央”七、八月份要有新精神；四、下半年全国趋势要解决问题多的省的问题，解决云南问题可能八、九月；五、江青有可能当主席的传闻；六、我同吴煌煜关于要树立一些造反派领袖人物，同走资派斗争要讲求策略的谈话。议论过省委领导班子，提到过三个人，其中有黄兆其。

下面是从“四人帮”设在清华大学的黑据点查获的、张健农盗用文化部送公文的渠道，为朱、黄、刘帮派给“四人帮”送黑材料的信封原件的影印件



5. 通过林敬荣等人向“四人帮”的黑据点告黑状，领取黑旨意

下面是林敬荣的揭发交代（节录）

我们准备趁上京之机向“中央”反映情况，要求尽快解决云南问题（即改组云南省委）的打算告诉了黄兆其，他表示赞同。

我们到北京后，通过张健农找了清华大学的吴焯煜，还找了红旗杂志社的许健生，人民日报来昆的头两批“记者”，通过这些人向“四人帮”送了黑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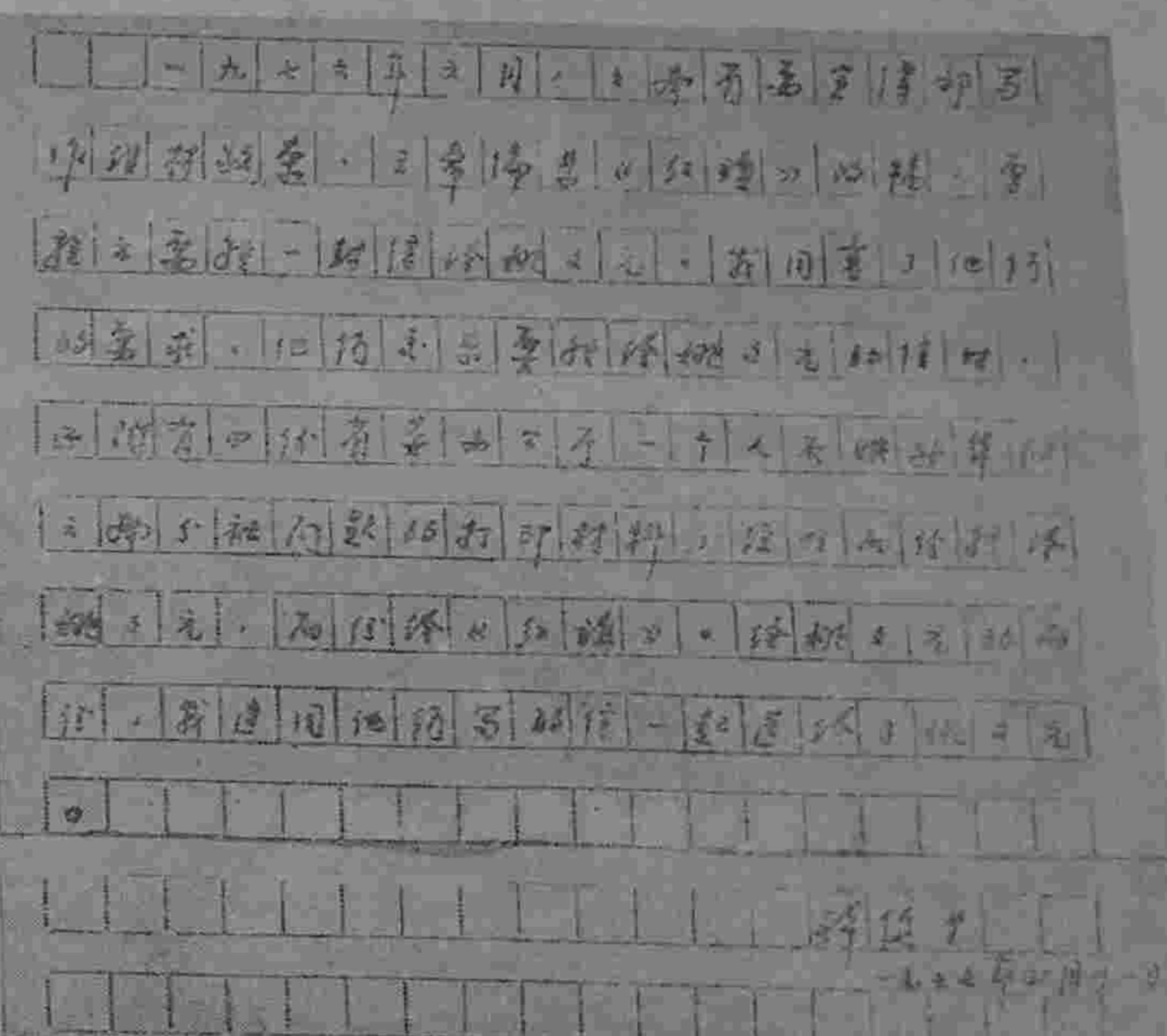
吴焯煜告诉我们：要联系实际，联系实际就是搞走资派；毛主席关于夺权的指示没有过时，现在只是夺的形式不同，你们云南省委是走资派占主导地位；云南好象有一个脓包现在还没有穿透，要注意走资派的新动向，这是上面的意思，眼睛要紧紧地盯住走

资派，等等。

回昆明后，我把听到的这些“四人帮”的黑指示，向黄兆其作了汇报。

四月份，涂晓雷从北京回来后曾对我讲，吴焯煜说：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体系。

下面是原《红旗》杂志编辑小组许健生写的证明材料（节录）原件的影印件



影 印 件 原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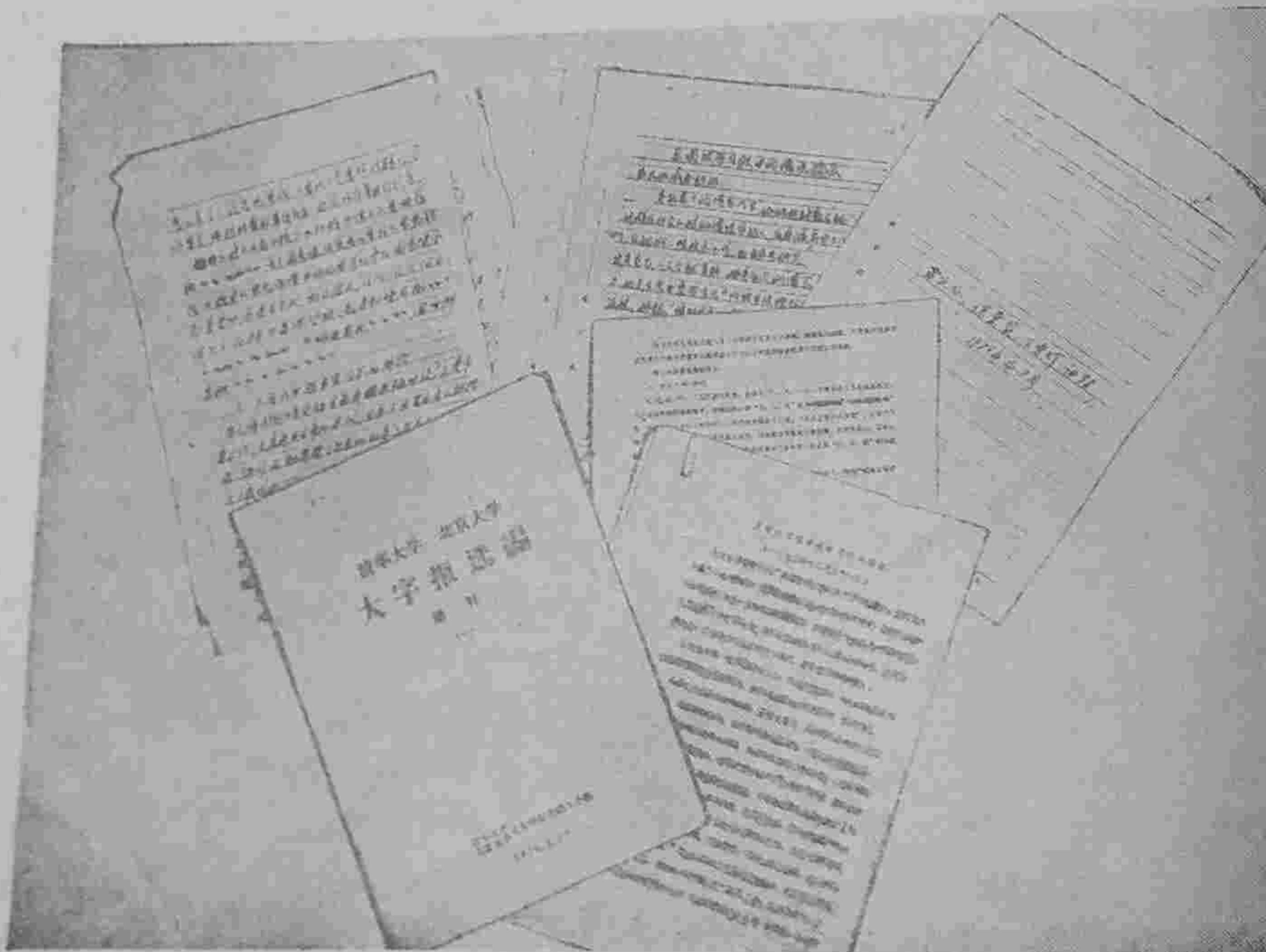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六月，云南省委宣传部写作组林敬荣、×××来《红旗》改稿，曾提出要转一封信给姚文元。我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交来要转给姚文元的信时，还附有四份省委办公厅一个人反映新华社云南分社问题的打印材料，注明两份转给姚文元，两份给《红旗》。给姚文元的两份，我连同他们写的信一起送给了姚文元。

许健生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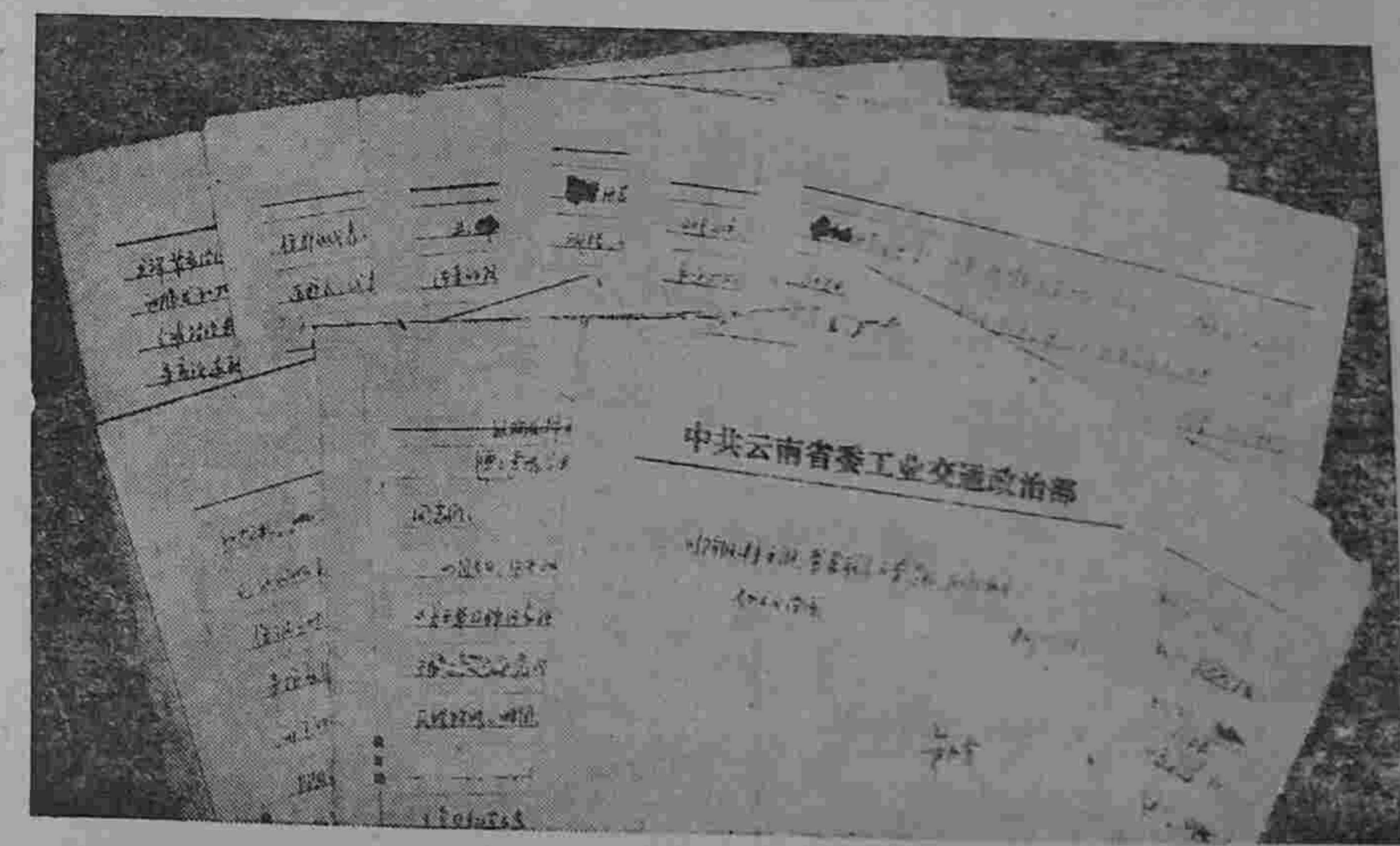
二、大量翻印散发“四人帮”及其余党的黑讲话、反动大字报

下面是黄兆其及其帮派骨干，大量翻印散发“四人帮”及其余党马天水、徐景贤、刘庆棠等人的黑讲话，清华、北大的反动大字报等材料的汇集影印件



三、倾巢出动，反革命叫嚷甚嚣尘上

下面是黄兆其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省级机关召开的一次大会上，恶毒攻击省委〔1975〕二十六号文件，全盘否定我省一九七五年大好形势的发言稿原件的影印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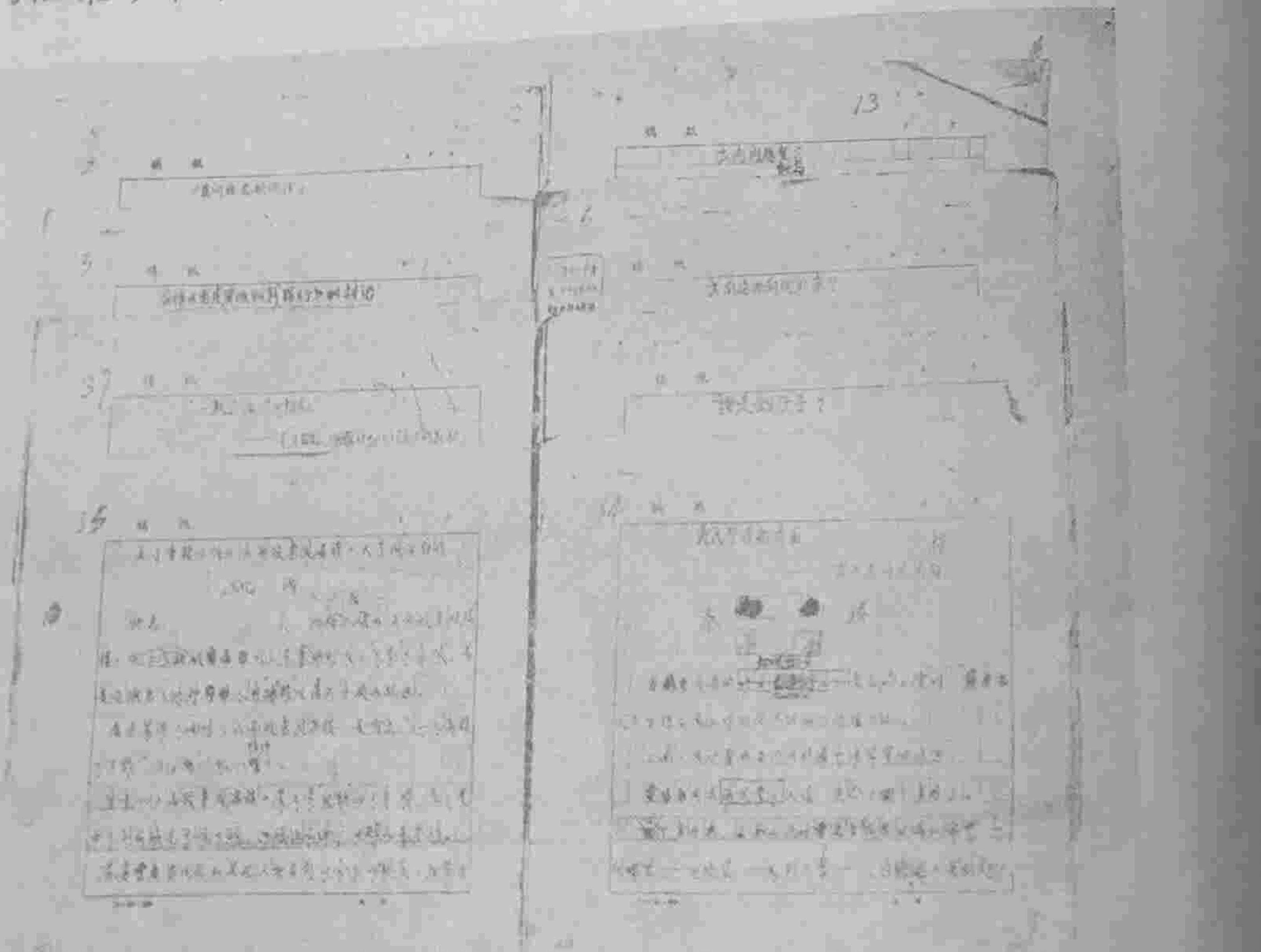


同党内资产阶级斗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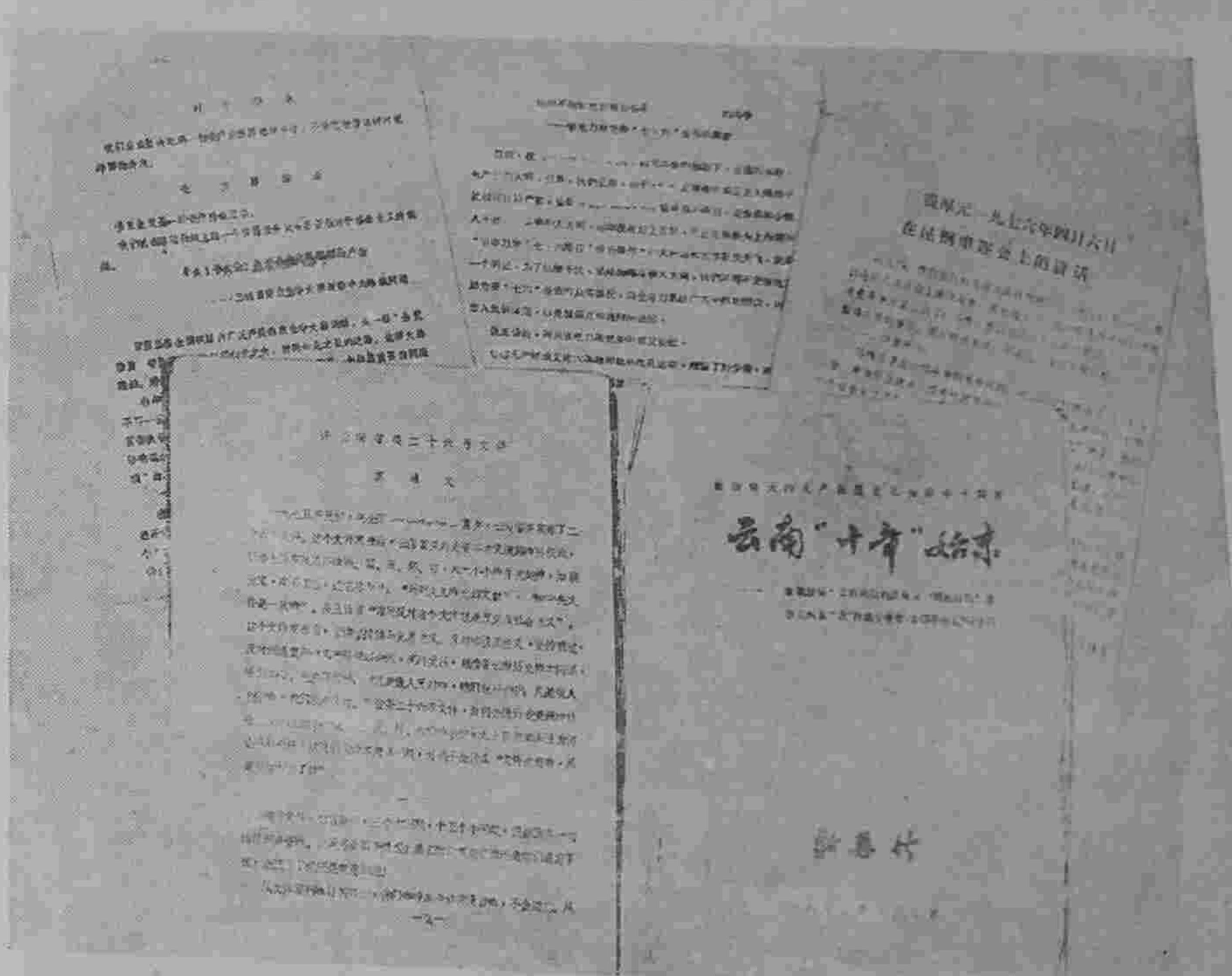
—纪念中国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通知》三周年

左面是
黄兆其发表
在一九七六年
五月十九日
《云南日报》
上题为
《同党内资
产阶级斗到
底》黑文的
影印件

下面是朱、黄、刘帮派喉舌“秦臻”、“姚雨”反动大字报底
稿的汇集影印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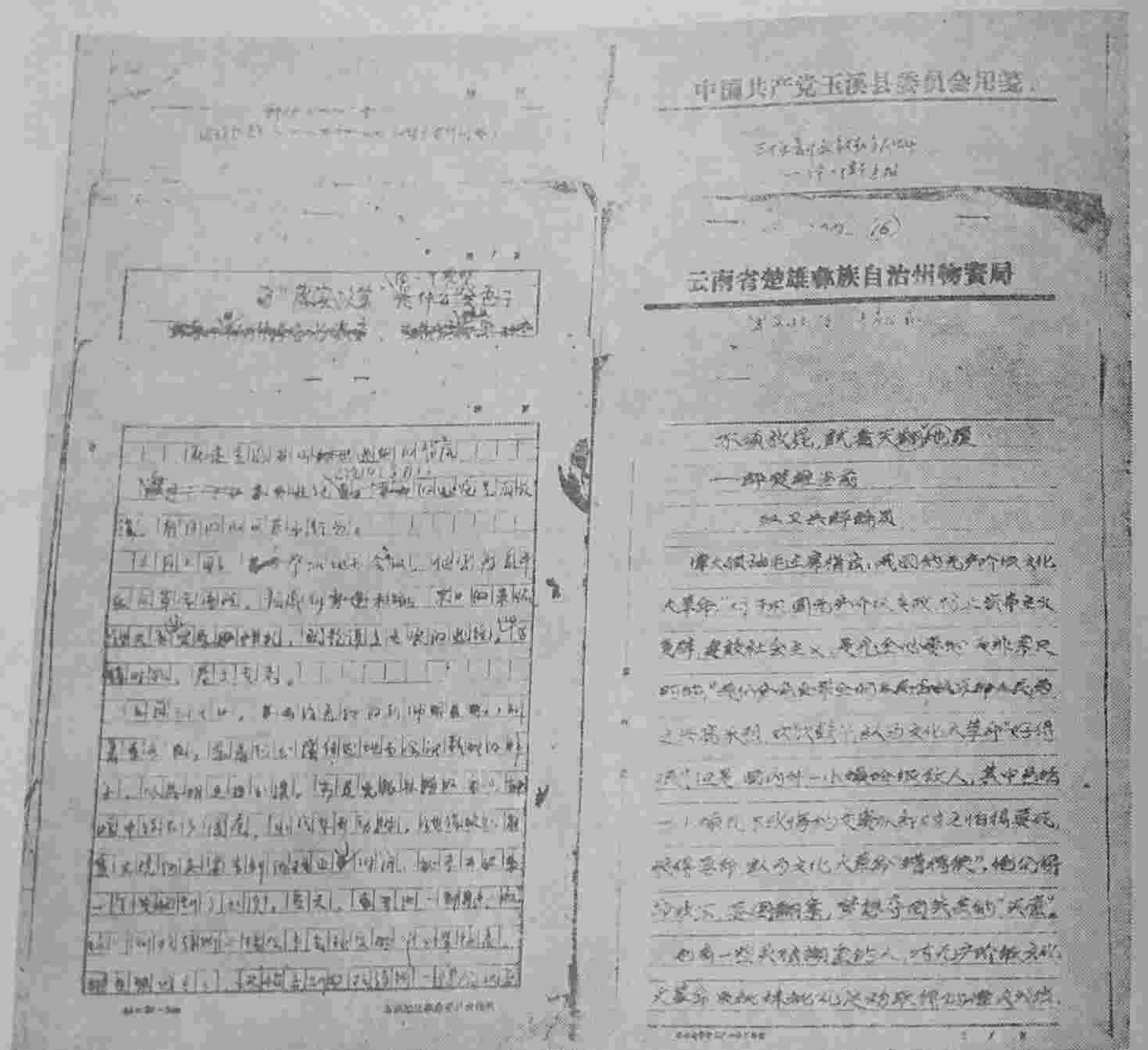


下面是省电力局、云天化、三五六厂等单位朱、黄、刘帮派骨
干的黑报告、黑文章和反动大字报汇集影印件



下面是楚雄、玉溪等地区朱、黄、刘帮派骨干的反动大字报汇

集影印件



下面是黄兆其及其帮派在黑报告、黑文章、反动大字报中竭力宣扬的主要反动论点：

(一) 鼓吹臭名昭著的“张春桥思想”，贩卖“阶级关系变动论”、“阶级路线过时论”和“参加民主革命有罪论”，歪曲和篡

改党的基本路线，颠倒敌我关系，搅乱阶级阵线。

他们一方面歪曲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指示，硬说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它是“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演变而来的”。诬蔑民主革命时期参加党的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找出路”，“把参加革命当做入股分红”，“妄图大捞一把”，因此，“民主派”必然变为“走资派”，“由革命的动力变成革命的对象”。咒骂老干部是“还乡团”、“复辟狂”、“土皇帝”、“刽子手”、“腐儒”、“朽木”、“新垃圾”、“上过井冈山、太行山、大别山，死了上不了八宝山”，等等。另一方面，又胡说“出身好的最保守，出身不好的最革命”。叫嚣要依靠所谓“埋葬党内资产阶级的掘墓人——造反派”，特别是要依靠那些“地富出身的、被压了二十年，反对走资派造反精神最强的”和“头上长角角要硬，身上长刺刺要尖”的所谓“先进分子”。真是反动透顶。

(二) 秉承“四人帮”“建立文化大革命的体系”的黑旨意，鼓吹不仅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即“张春桥思想”)，而且要“建立文革式的组织体系”，煽动“第二次夺权”。

他们一方面攻击我们党是“民主党”，共产党员是“民主党员”，诬蔑“全国解放后，我国实际上承袭了旧的官僚国家体制”，咒骂我国是“按权力大小，以党、国家、上级领导的名义来瓜分劳动人民的财富”，“在榨取工农血汗方面，比资本家更残酷，统治更黑暗、更反动”。扬言“要用暴力彻底打碎、摧毁”所谓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实行铁的专政，把所有的职务——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都变成所谓“工人的职务”。同时，大肆诽谤我省各级党委是“走资派”结成的“神圣同盟”，是“资产阶级

的一元化统治”，“是‘还乡团’、‘复辟派’盘踞在各级领导班子的联合政府”，“从上到下是走资派控制党委的局面”。煽动“夺权是当务之急”，要“向省委发动毁灭性进攻”，“踏平阎王殿”，“把党政军财文大权夺回来”。另一方面，他们又到处宣扬“胆大有官做，乱世出英雄”的反动人生观。毫不掩饰地叫嚷“入党做官的责任，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身上”，“我们的胃口确实大得很”，不但能“打天下”，还要“坐天下”。声称要“在组织上动大手术”，“在权字上打翻身仗”。胡说，“老家伙坐在板凳上，我们一脚把他踢翻，自己坐上去，这就叫革命”。杀气腾腾地宣称，“走资派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不但要斗，而且要杀”，“现代的少正卯，要先杀掉现代的孔老二”，“最少要削掉他们的实权”，“把他们遣送回去”，“劝退一批，留作反面教员一批”。并恬不知耻地把自己封为“新生力量”和“造反派”的代表。明目张胆地提出要由造反派“占优势”，“掌实权”，“确立文化大革命体系”，“建立文革式的领导体制”。狼子野心，暴露无遗。

(三)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攻击中央一系列文件和省委[1975]二十六号文件。

去年，他们跟着“四人帮”的指挥棒转，对抗中央四号、五号文件，攻击省委按中央文件办“是改良主义的骗局”，他们还攻击经毛主席审查同意的省委二十六号文件是“以反派性为纲”、“整顿为纲”的所谓“折衷主义的文件”，“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领”，胡说资产阶级派性“是党性的集中表现”，反派性是“打击新生力量”，“镇压造反派”的“大棒”和“杀人刀”；“整顿就是复

辟”，“就是右倾翻案”。诬蔑落实政策是“请隐士，举逸民”，“拼凑翻案复辟的黑班底”。他们全盘否定一九七五年的大好形势，胡说贯彻省委二十六号文件是“对新生力量大砍大杀，对复辟势力大举大清”，“造成了复辟派掌权，还乡团执政的局面”，“不亚于波旁王朝之复辟，袁世凯之称帝”。他们在批林批孔中，刮起揪“现代大儒”，大抓“复辟势力”的黑风恶浪，造谣惑众。去年，他们又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反动气焰，嚣张至极。

四、利用文艺进行反党，炮制毒草作品

下面是杨苏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反动电影《反击》式的毒草话剧《典型报告》和《搏斗》，是朱、黄、刘帮派按照“四人帮”“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黑旨意炮制出笼的。这两株毒草，把罪恶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英明领袖华主席。是全国重点批判的毒草作品之一。

黄兆其对《典》剧的演出是十分卖力的。戏刚开始彩排，就请了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审查”，并组织了所谓“革新派”专场，把朱、黄、刘帮派的大小头目请来“审查”，涂晓雷守门迎接。黄的心腹林敬荣还专门陪同人民日报“记者”前来“审查”。帮派批准后，未经省委审查，乔庄就指使登报公演。十月五日省委领导同志看完《典》剧后，黄兆其叫嚷“我举双手赞成这个戏，写的好”，还组织帮兄弟写大字报吹捧这株大毒草。

下面是毒草剧本和吹捧《典》剧的大字报影印件



第三部分

对抗中央[1976]四、五号文件 疯狂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

黄兆其及其帮派，根本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公开对抗中央[1976]四号、五号文件，另搞一套。他们施展种种阴谋诡计，控制、操纵省委召开的三月地书会、五月理论讨论会等几个重要会议，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篡党夺权的黑风。他和朱克家、刘殷农等，胁迫和伙同前省委主要负责人，炮制了省委[1976]四十号文件，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特别是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认为“四人帮”“登基”、“庆典”的时机已到，多次召开黑会，密谋策划，进一步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一、破坏地书会议，刮起改组省委的黑风恶浪

去年三月省委召开地书会议，贯彻中央〔1976〕四号、五号文件。在会上，朱克家公然对抗中央规定，擅自传播“四人帮”在打招呼会议上的黑指示，制造混乱，煽动夺权。黄兆其和刘殷农等，紧密配合，进行捣乱破坏。会前，黄兆其召开帮派黑会，策划确定了破坏会议的行动方针；会中，里应外合，纠集一伙帮兄弟，冲击会议，揪斗领导干部，给省委施加压力，强迫省委向“四人帮”一边“转弯”；频繁串连，炮制黑电报，煽动签名，告省委黑状，狂叫要“改组省委”，妄图取而代之。

下面是沈炳章的交代（节录）

去年三月初，在省委召开地书会议前，刘殷农、涂晓雷、张奎林、徐宝兴和我，在黄兆其家开黑会，黄兆其在会上谈了破坏地书会议的方针：省委必须承认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对于省委〔1975〕二十六号文件不能批，要抓贯彻中的问题；把各单位撤、免、停、调的干部人数统计出来，公布出去。黄兆其还说：“要把这次大会变成控诉大会。大家都要准备一下，上去控诉，以便教育到会的同志。但要首先有人带头上去先说几句，然后一个一个的接着上台去讲，气氛搞热烈一点，在有些问题上，可以叫贾启允等人回答问题，造成这个会由我们来掌握会场，要把他们的威风扫地。老沈，你不是早就提出过要同省委辩论吗？你先带个头怎么样？”我说：“好”。以后，我就按照黄兆其的安排，带头冲击了地书会议的第一次大会。

下面是何立宽的揭发交代（节录）

在地书会议期间，我找过黄兆其四次。黄兆其对我说：“这次会议争论最大的是（省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还是受影响的问题。不管怎么样，这次会议一定要开好。这次会议是个关键的会议，是帮助省委转弯子的会议。最近有几个地区的‘告状团’已经来了，你们文山的来了没有？”我说：“没有”。黄说：“应该来，来配合一下，促使省委转好弯子。”我说：“好，我写信回去叫他们来。”

下面是王海泉的揭发交代（节录）

去年三月，省委地书会的一个晚上，刘殷农叫曹光祥通知马首良和我到曹光祥家，刘殷农说：“我们准备给中央拟一个电报稿，你们来帮我一下忙”。他说了电报（内容）的意思后，我和马首良分头执笔起草，曹光祥参加研究，刘殷农修改。电报的内容：一、希望中央派人来领导云南的运动；二、希望中央派观察员来了解云南运动的情况；三、成立老、中、青三结合领导运动的班子。

后来，刘殷农说：“这个稿子拿到会上去又作了修改，发动了到会人员签名。会上有一百多人签了名。”

注：王海泉交代的电报稿，是黄兆其、刘殷农一伙策划草拟的一个初稿。根据我们查获的另一个修改稿，内容更为反动。黄兆其一伙在这个电报稿中，用十分恶毒的语言，诬陷和攻击邓小平同志；告省委的黑状，说省委几个主要负责同志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翻了案，算了帐”；叫嚣要组成什么“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来领导运动”，妄图改组省委，取而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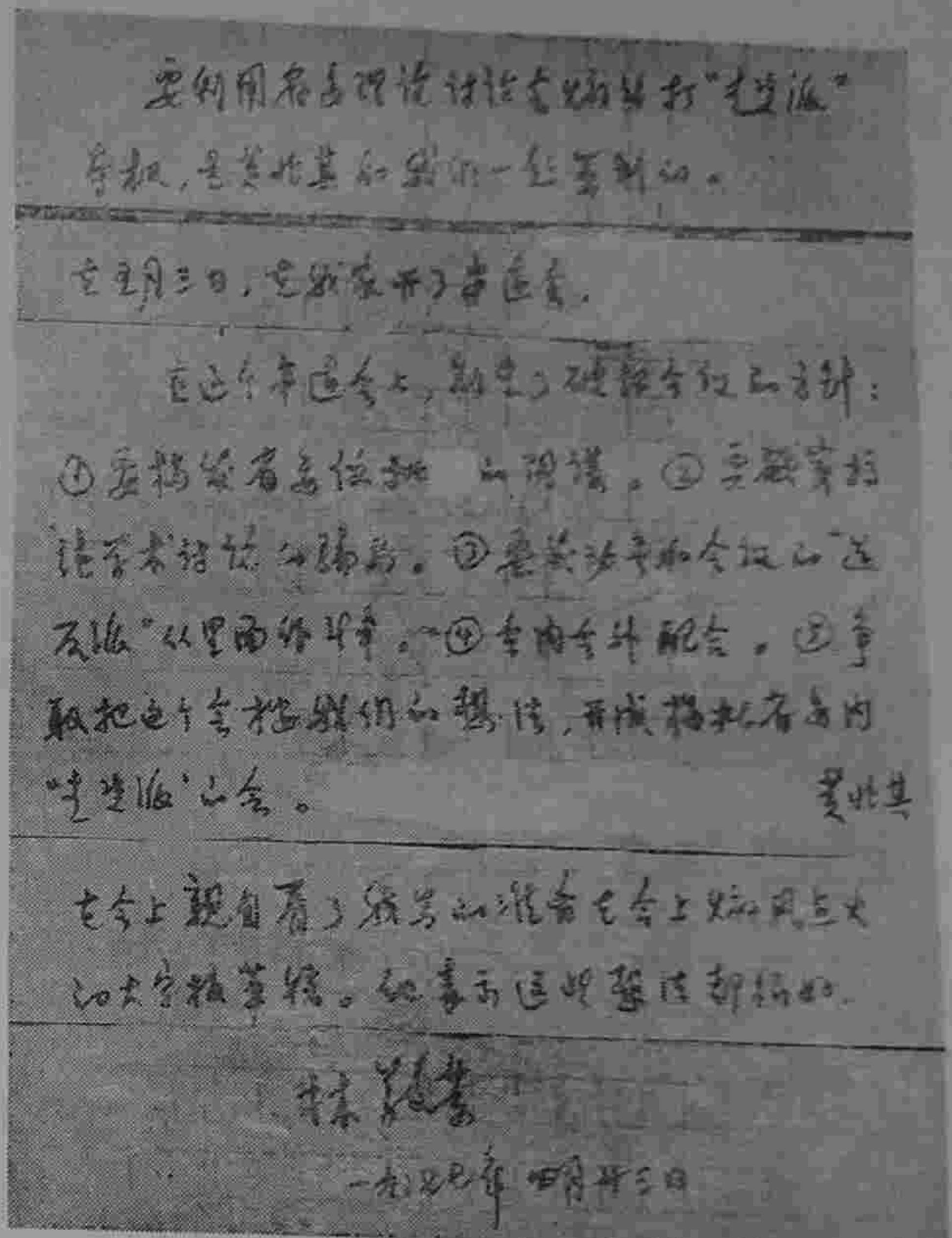
二、控制理论讨论会议，煽动层层夺权

去年五月，省委召开理论讨论会，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这次会议，实际上被朱、黄、刘帮派所把持。会前，黄兆其同他的心腹林敬荣密谋策划，作了控制会议的周密部署；会上，他们竭力歪曲毛主席的指示，大肆贩卖臭名昭著的“张春桥思想”；狂叫“要把这次会议开成揭批省委内走资派的会”；朱克家赤膊上阵，发表黑讲话，杀气腾腾地叫嚷云南是“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公开煽动“要抓权”。这股夺权妖风一直刮到全省，危害很大。

下面是谢承彦、李赞绪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朱克家、黄兆其对省委理论讨论会的破坏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会前，黄兆其同他的帮派兄弟多次密谋策划，要在这个会当作抓“走资派”的战场，“把这个会开成揭发批判省委内走资派的会”，并制定了实现这个罪恶目的的五条措施。在会上，他们按“原定部署”，打着联系实际的幌子，诬蔑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是“纯学术讨论”，攻击省委几个领导同志是“修正主义路线的积极鼓吹者和执行者”，煽动“抓省委内的走资派”，还给一些单位的领导同志扣上“复辟派”、“还乡团”等帽子，要省委把这些人迅速“调离或免职”。闭幕会上，朱克家又搞突然袭击，发表了一个反党讲话，公开号召夺权。由于朱、黄等人的捣乱，他们的帮兄弟在会上更加放肆地点名批判和围攻省委领导同志，搞得会上乌烟瘴气。会后，朱克家的反党讲话流毒全省，黄兆其等人的黑货贩至专县，在全省掀起“层层抓走资派，处处揪还乡团”的黑风恶浪，有些地方甚至大搞“武力转弯”、“棍棒夺权”，使全省革命和生产遭受很大破坏。

下面是林敬荣的揭发交代原件（节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要利用省委理论讨论会煽动打“走资派”、夺权，是黄兆其和我们一起策划的。
在五月三日，在我家开了串连会。
在这个串连会上，制定了破坏会议的方针：①要揭发省委假批的阴谋。②要戳穿搞
纯学术讨论的骗局。③要发动参加会议的“造反派”从里面作斗争。④会内外配合。
⑤争取把这个会按我们的想法，开成揭批省委内“走资派”的会。黄兆其在会上亲自看
了我写的准备在会上煽风点火的大字报草稿。他表示这些想法都很好。

林敬荣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三、胁迫和伙同前省委主要负责人炮制省委四十号文件，披上合法外衣进行篡党夺权

省委〔1976〕四十号文件，是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等，胁迫和伙同前省委主要负责人炮制出来的一个另搞一套的坏文件。朱克家说：“省委四十号文件，是我一字一句抠出来的。”黄兆其说：“要充分肯定这个文件，这是我们斗的结果！”贾启允同志说：“按照省委四十号文件转弯，是不可逾越的一步。”他们根本不听各级党委的意见，无视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对，强行通过，强迫执行，把许多领导班子搞成瘫痪、半瘫痪，使全省更加混乱。

下面是胡廷观的揭发交代（节录）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八日，贾启允同志在部、委、办负责人会议上作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篡改伟大领袖毛主席制定党的基本路线，把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说成是走资派与造反派的矛盾；公开承认省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省委内有走资派；把当时黄兆其一伙制造的混乱局面归罪于“各级党委思想弯子没有转好”，公开号召“要联系本地区、本单位走资派还在走这个实际”，层层揪走资派。几天后，我同黄兆其谈起贾启允的这个讲话时，黄对我说：“贾启允的这些观点，是我们几个人给他谈的，他都接受了。”贾启允的这次讲话，也就是后来形成省委四十号文件的主要内容。

下面是省建查获的徐宝兴的《备忘摘记》（节录）的影印件。摘记上记有黄兆其等帮派头目几次开黑会修改省委四十号文件（初稿）的主要内容。

七月份
① 贾启允：做了许多不指名的安排
② 石善亭：忙于工作
③ 研究度成以：
对“四老”取了多次修改意见
八月一日
△和沈祖荫上法便对和王生海、孙
八月二日
△和贾启允丁东指正稿意见
李群
④ 王善亭：
⑤ 黄兆其：
⑥ 黄兆其：
总的原则：首先从各方面
就地取材，逐段修改

影印件原文

七月十六日：

晚，黄、刘、张、沈、T（涂）、胡等，在杨文龙（慰农）家研究，谈到：

②省委常委情况，

常委会纪要，

③研究定几件事：

1. 对“纪要”（初稿）取否定态度，抵制批判。

2. 对班子现不要搞，先解决纠正问题。

八月一日：

△和沈炳章交谈他对四十号文件的看法。

八月六日：

晚上，黄、刘、张、T（涂）在杨家碰头，沈未到。

③关于省委纪要问题。

4. 黄（兆其）谈：

①省委纪要，

总的看法是一分为二，肯定其进步方面，提出不足之处，建议修改。

下面是宋醒言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黄兆其与金奕旦相互勾结，按照省委四十号文件的调子，于一九七六年八月，武力威逼煤管局党委几个老同志开会“转弯”。九月五日，黄窜到会上，给局党委成员进一步施加压力说：“转弯子不容易，是一场斗争，不要讲情面，要同党内资产阶级斗、同走资派斗。你们党委内有没有走资派？！”叫嚷“走资派是敌我矛盾”，“要对着干”，扬言“要一个局一个局地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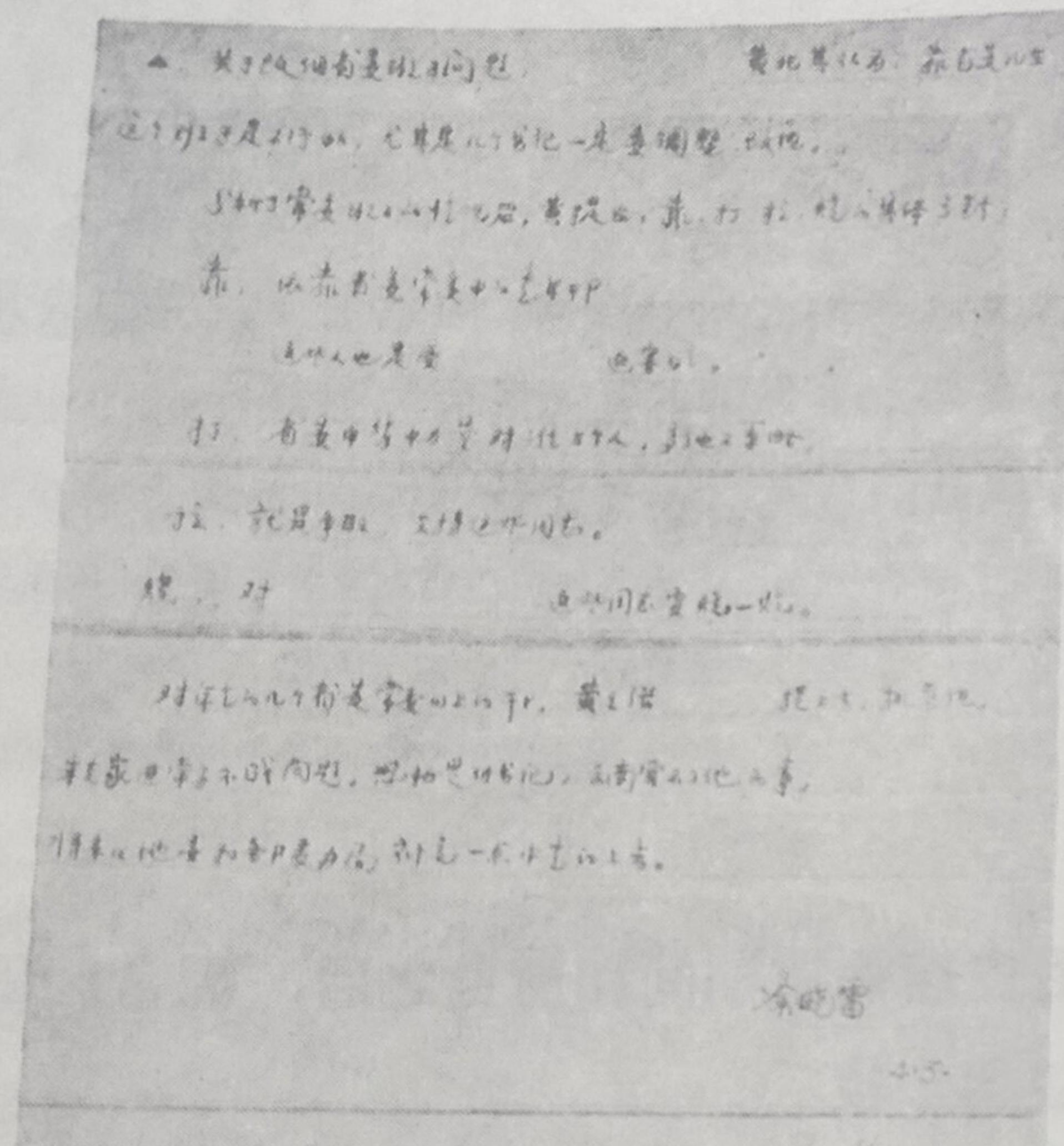
下面是祁山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去年八月，黄兆其多次说：“省委四十号文件是符合中央精神的，要坚决贯彻。”还说：“你们党委一定要转好弯子，这是不可逾越的一步。”我们党委开会，搞了一个统一思想的文件。其中有段话是：“一九七五年，我们贯彻经毛主席、党中央同意的省委〔1975〕二十六号文件，受到全省人民的热烈拥护，……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定成绩，这是应该肯定的。”黄兆其看后，蛮横地指责我们，说这段话和省委四十号文件不一致，必须照省委四十号文件的提法修改。

四、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之后，配合“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黄兆其一伙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炮制了分裂省委的反动方针，搜集、私整诬陷省委、昆明军区党委以及各级党委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向“四人帮”报送了改组省委的黑报告，煽动帮兄弟给“四人帮”写“效忠信”、“劝进书”，献计献策献媚，要“四人帮”赶快当“女皇”、做“宰相”，挑起“军国重任”。真是反动透顶。

下面是涂晓雷关于炮制分裂省委的反动方针的交代原件（节录）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关于改组省委班子问题。黄兆其认为：靠省委现在这个班子是不行的，尤其是几个书记一定要调整、改组。

分析了常委班子的情况后，黄提出：靠、打、拉、烧的具体方针。

靠：依靠省委常委中的青年干部。这些人也是受迫害的。

打：省委中集中力量对准三个人，多了也不策略。

拉：就是争取、支持这些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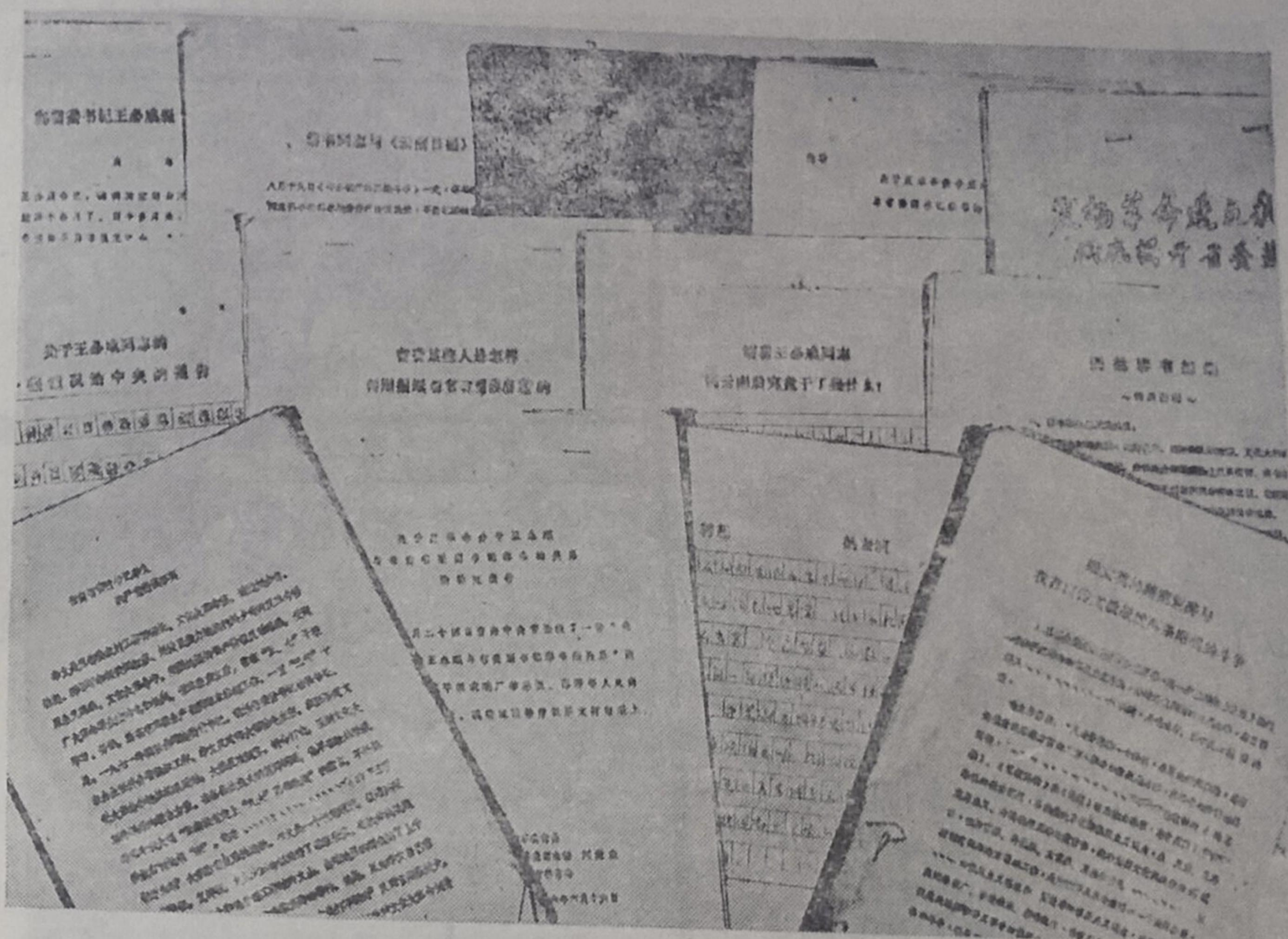
烧：对（某某）这些同志要烧一烧。

对年轻的几个省委常委以上的干部，黄主张提上去，挑重担。朱克家进常委不成问题，恐怕是副书记，云南管不了他的事。将来从地委和各部委办局补充一点中青的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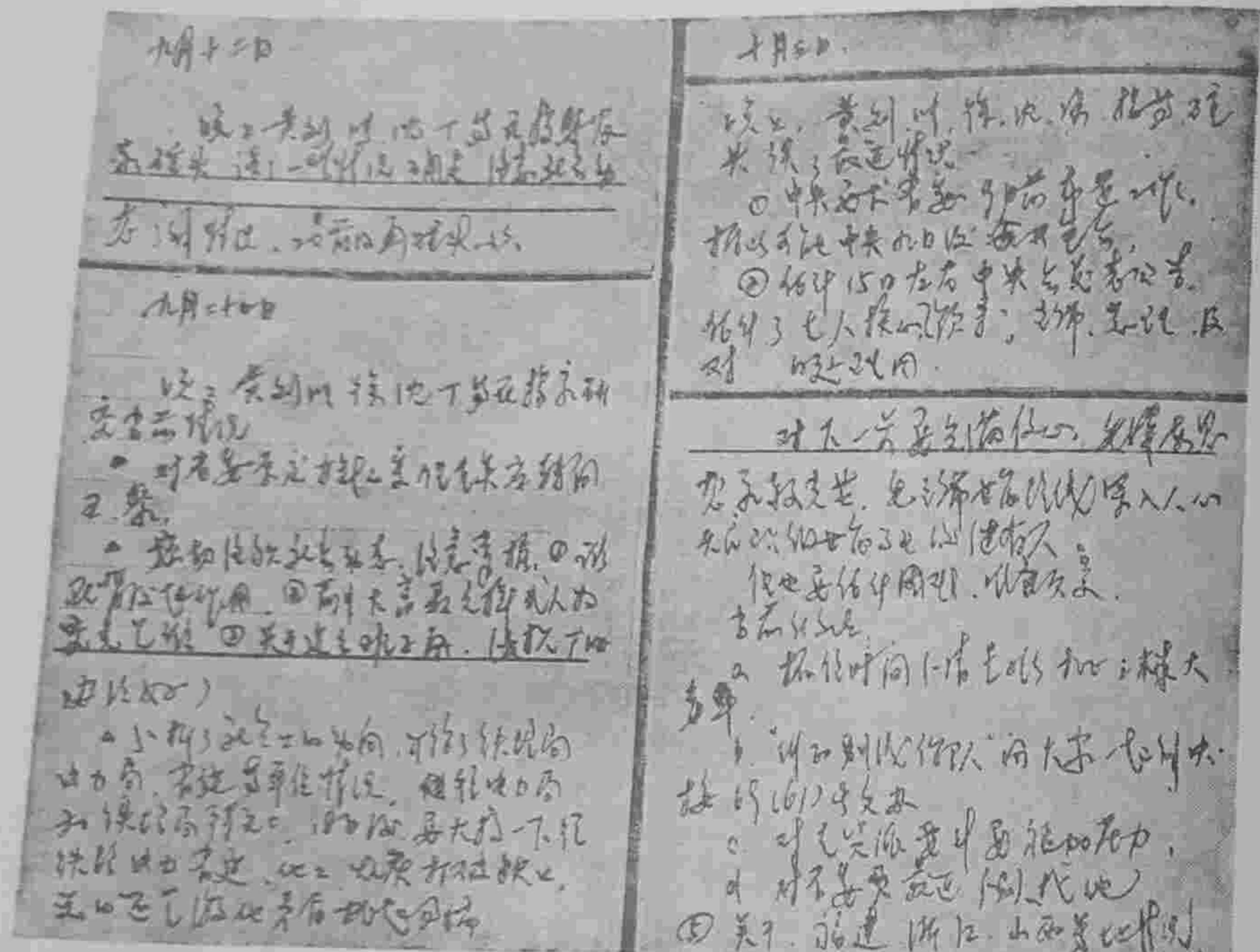
涂 晓 雷

4.5.

下面是黄兆其及其同伙搜集、私整诬陷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领导同志的部分黑材料原件影印件



下面是省建查获徐宝兴的《备忘摘记》（节录）的影印件。上面记有毛主席逝世后，黄兆其等帮派头目多次开黑会，策划加快篡党夺权步伐的反动内容。



影 印 件 原 文

九月十二日：

晚上，黄、刘、张、沈、T（涂晓雷）等在杨懋农家碰头，谈了一些情况，确定注意社会动态，了解情况，二十日前后再碰头一次。

九月二十日：

晚上，黄、刘、张、徐、沈、T（涂晓雷）等在杨家研究当前情况。

对省委原定方针不变，但重点应转向王、黎。

△密切注视社会动态，注意掌握①谁在背后起作用；②蒯大富、聂元梓式人物究竟是谁；③关于建立班子问题（云机厂的办法好）。

△分析了社会上的动向，介绍了铁路局、电力局、省建等单位情况。从电力局和铁路局得知，十八日后，要大搞一下，从铁路、电力、石油、化工、煤炭打破缺口，总的还是激化矛盾，挑起事端。

十月三日：

晚上，黄、刘、张、徐、沈、涂、杨等碰头，谈了最近情况。

①中央要求省委九日前布置工作，据此可能中央九日后开全会。

②估计十五日左右中央会发表公告，估计了七人领导核心，主席、总理。

对下一步要充满信心，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但也要估计困难，准备反复。

当前做法

a、抓住时间，分清是非，批三株大毒草

b、纠正划线站队问题，大家一起解决，按69[61]号文办

c、对走资派要斗，要施加压力

d、对省委贾，最近分别找他

⑤关于福建、浙江、山西等地情况

云南省摄影艺术展览办公室

《人民日报》谢、郭二记者，

您好。

主席逝世以后，大家都很关心云南问题的解决。我们问您们的关键在哪里？如何解决云南问题？我们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供您们研究参考。若认为有必要，请转报中央有关领导同志。

我们认为，解决云南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好省委班子的问题。云南省委班子，经过去年大调整之后，从班长到成员，握有实权的几乎全是“还在走”的走资派或犯严重走资派错误的人。他们从数量和能量上都占据了矛盾的主导面，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青、中力量在省委班子中却处于从属和受支配的地位。一句话，云南省委是以屡犯走资派错误的“老、老、老”为主体的省委。

在省委中一些犯走资派错误的老同志作适当调整之后，还必须再充实和加强一些新生力量。

现有省委常委中的新干部要挑更重的担子，彭贵和

同志可以多参加一些全局性的工作。朱克家同志，年轻敏锐，斗争性强，建议在省委内担任常委或副书记，并分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朱克家同志近十年来在省部级部门工作过，这也是多年的斗争实践证明了的。省委还必须选拔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革命造反派优秀分子和批林批孔中涌现的有高度

觉悟的青年干部到省委班子中来。原参加省委工作的黄兆其、张翠芬在去年取消了，建议恢复并考虑他们进常委班子的问题。此外，也可以从现在的地委、厅局级中年干部中选拔一、二名优秀干部上来。

考虑到有利于斗争，请代我们保密。

此致

无产阶级的战斗敬礼！

涂晓雷

林敬荣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昆明

左面是涂晓雷、林敬荣根据黄兆其的黑旨意写的改组省委的黑报告原件(节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人民日报》谢、郭二记者，

您好。

主席逝世以后，大家都很关心云南问题的解决。云南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如何解决好云南问题？我们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供您们研究参考。若认为有必要，请转报中央有关领导同志。

我们认为，解决云南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好省委班子的问题。云南省委班子，经过去年大调整之后，从班长到成员，握有实权的几乎全是“还在走”的走资派或犯严重走资派错误的人。他们从数量和能量上都占据了矛盾的主导面，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青、中力量在省委班子中却处于从属和受支配的地位。一句话，云南省委是以屡犯走资派错误的“老、老、老”为主体的省委。

在省委中一些犯走资派错误的老同志作适当调整之后，还必须再充实和加强一些新生力量。

现有省委常委中的新干部要挑更重的担子，彭贵和同志可以多参加一些全局性的工作。朱克家同志，年轻敏锐，斗争性也强，建议在省委内担任常委或副书记，并分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光靠现有的这几个青年干部还不够，这也是多年的斗争实践证明了的。省委还必须选拔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革命造反派优秀分子和批林批孔中涌现的有高度路线斗争觉悟的优秀代表，到省委班子中来。原参加省委工作的黄兆其、张翠芬在去年取消了，建议恢复并考虑他们进常委班子的问题。此外，也可以从现在的地委、厅局级中年干部中选拔一、二名优秀干部上来。

考虑到有利于斗争，请代我们保密。

此致

无产阶级的战斗敬礼！

涂 晓 雷

林 敬 荣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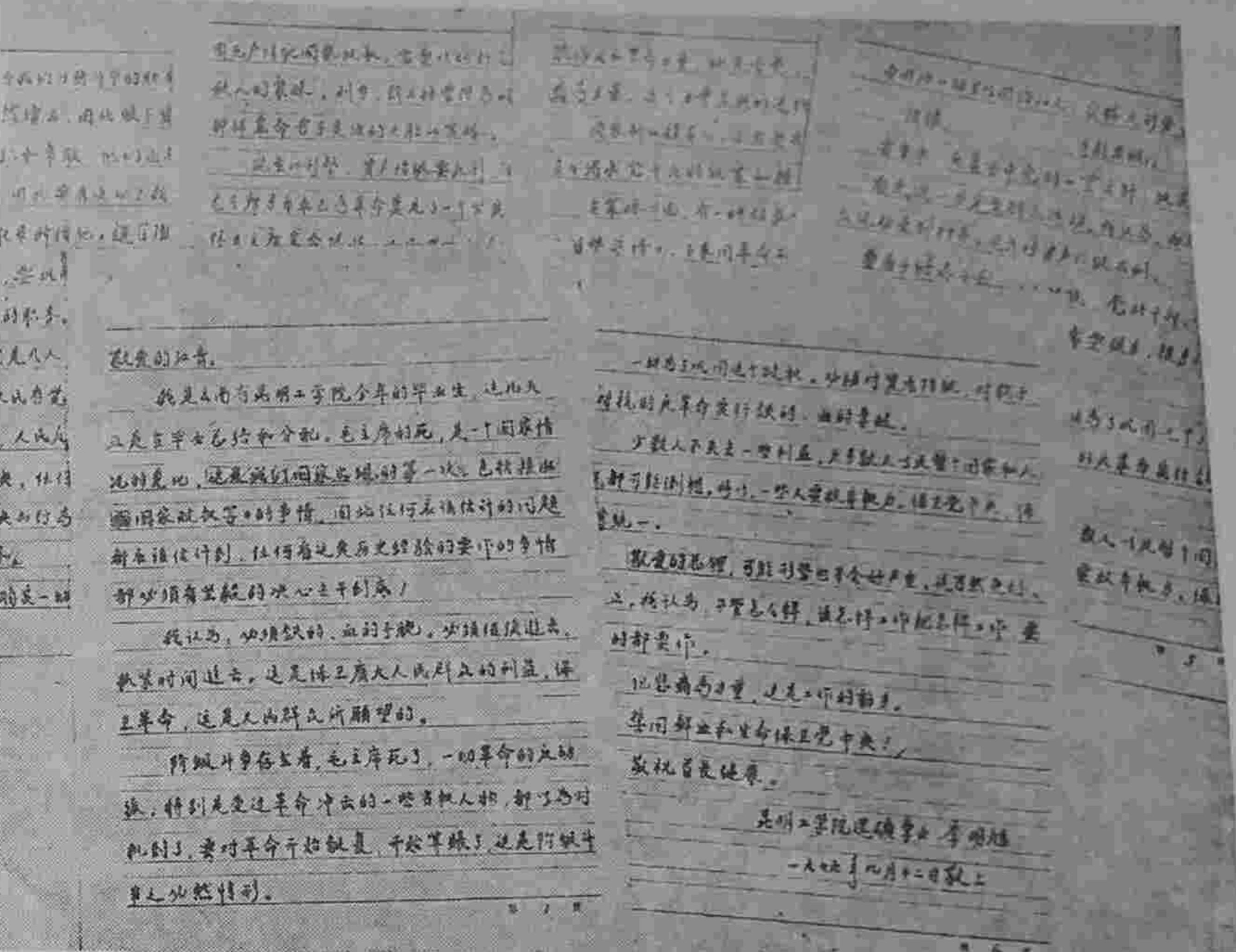
下面是朱、黄、刘帮派骨干李明旭、李有实给“四人帮”的“效忠信”、“劝进书”的反动内容：

一、肉麻地吹捧江青是毛主席的“学生”、“战友”，无耻地向江青表示“效忠”说：“我们誓之日月，赤心对天”，“坚决拥护”。

二、要“四人帮”赶快当“女皇”、做“宰相”，挑起“军国重任”，狂叫“时乎不待！此其时也！此其时也！”“千万！千万！至要！至要！”“万勿推辞！”“何辞为！何辞为！”

三、向“四人帮”献计献策，要趁老干部正处在悲痛之中的时候，“采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手法，“撤销他们的领导权”，叫他们“当百姓、做凡人”。建议江青用“铁的手腕”，关一批，“血的手腕”，杀一批，“抓紧时机进击”，“毫不手软”，“实行铁的、血的专政”。

下面是李明旭写给“四人帮”的“劝进书”的影印件



五、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图谋乱中夺权

黄兆其一伙秉承“四人帮”“搞垮一个工厂企业，就给省委书记脖子上套一根绞索”的黑旨意，指使帮兄弟，搞乱工业、搞乱农业、搞乱商业，乱中夺权。他们恶毒攻击中央〔1975〕二十号文件是“又粗又黑的修正主义纲领”，攻击贯彻中央〔1975〕九号文件是“推行修正主义黑货”；煽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回

机关“造反”；狂叫“亩产一千斤是修正主义，亩产两千斤是帝国主义，跟着我们造反，亩产两百斤也是社会主义”；“揪走资派游街，要一百辆车都有，搞其他一张车也不给”；还制造了全国罕有的交通警“罢岗”事件。全省各族人民深受其害。

下面是李双方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去年八、九月间，黄兆其连续三次窜到我们机械局，按照“四人帮”的腔调，狂叫“文化大革命后的老干部，总是要寻找机会整造反派。”“省委不转弯，我们就要对着干！”“走资派不转弯，我们就要坚决斗！”甚至居心险恶地提出“现在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口号，赤裸裸地把矛头对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黄兆其的煽动下，机械工业系统的帮派骨干也大叫大嚷：“要跟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斗争到底！”“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上去了！”造成不少工厂停工停产，靠借款、贷款、预收货款发放工资，使一九七六年我局直属企业生产总值仅完成年计划百分之三十六点七，全省机械工业生产倒退到一九六一年的水平。

在黄兆其一伙的反革命煽动下，一小撮阶级敌人猖狂向党进攻。下面是王秦泰炮制的恶毒攻击中央〔1975〕二十号文件，把矛头指向华主席的反革命大字报（节录）

二十号文件是公开贩卖“三项指示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宣扬唯生产力论。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得不翻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祖传法宝，接过普及大寨县的口号，利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硬把一条又粗又黑的修正主义纲领塞进来，搞出了一个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文件》，别有用心地把农业学大寨运动往邪道上引。按照《文件》县委是关键的精神，进行了整党整风之后，竟连一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

没有。县委是关键，地、州、省委关键不关键呢？各级存不存在党内走资派呢？要不要矛头指向呢？《文件》不提。

下面是翟士杰、夏嘉昆、杨强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朱、黄、刘反革命黑帮，七六年指使交通大队的个别坏人，任意冲击机关，到处揪斗、绑架领导干部，还美其名曰打“走资派”、赶“还乡团”，诬蔑坚持工作的同志是“还乡团丁”，“给走资派脸上贴金”，煽动了历时四个多月的全国罕见的民警“罢岗”事件。由于“罢岗”，造成政治上的极坏影响，经济上的极大损失，社会秩序混乱，交通事故急剧上升，仅交通岗周围发生的车祸约八十起，还发生了十四起肇事逃跑案，昆明市全年因车祸伤亡高达一千余人，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万元。

下面是昆明市财贸办公室的揭发材料（节录）

去年，朱、黄、刘一伙，胁迫和伙同前省委主要负责人，炮制了省委〔1976〕四十号文件，严重地冲击了昆明市财贸战线，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困难。全市公司以上领导班子五十一个，就有二十二个的领导权被帮派控制。一九七六年全市商品购销总额、社会商品零售额、农副产品采购、工业产品采购、商业利润等八个主要指标比七五年大幅度下降，最多的下降达百分之四十五；财政收入只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五十四；许多吃、穿、用生活必需品经常脱销，特别是生活用煤供不应求，有的群众连续几天几夜排队还买不到，影响极坏。

第四部分

强行释放罪犯 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去年，黄兆其扛着“四人帮”的“打开监狱找左派”的黑旗，网罗牛鬼蛇神，作为他们帮派的基本队伍。他们把被我专政机关关押的罪犯称作“战友”、“新生力量”，封为“反潮流的英雄”、“左派”、“反修战士”。诬蔑我们对这些罪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打击新生力量”。他们施展各种卑劣手法，给省委和各级党委施加压力，强迫释放罪犯，在全省刮起了一股释放罪犯的黑风。这些坏家伙被释放出来后，积极充当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搞篡党夺权的急先锋、黑打手，猖狂地进行阶级报复，大肆进行反革命和刑事犯罪活动，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恶果。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后，对这些强行释放了的罪犯，才又重新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

一、威逼省、市委释放在押的现行反革命、流氓罪犯 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

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是一九七五年依法拘捕的现行反革命、流氓犯罪分子。这些罪犯多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阴谋篡党夺权；包庇反、坏分子；制造武斗事件；煽动停工罢市；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奸污妇女；打击陷害好人。作恶多端，民愤极大，人称“许大马棒”、“春城一霸”。可是，黄兆其一伙却竭力地要把这几个坏家伙释放出来，妄图利用释放这些在押罪犯“影响”、“推动”全省，大乱全省，作为实现其反革命阴谋计划的“突破口”。

下面是龚学文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经黄兆其和刘殷农密谋策划，在去年四月十三日到七月十六日的三个多月中，由刘殷农出面，先后九次在昆明市委常委会上提出要释放现行反革命、流氓罪犯许少先等三人。刘殷农还在市委常委会上大放厥词说：“逮捕这三个人，路线错了，政策错了，方法错了，时间也错了；逮捕他们是压造反派，是给造反派脸上抹黑，给走资派脸上贴金；是打击新生力量，否定老中青三结合”。

下面是张奎林的交代（节录）

去年，六月市委党干会前几天，黄兆其、刘殷农通过涂晓雷把徐宝兴、沈炳章和我

叫到杨慰农家交谈。刘殷农说，这三个人的问题影响全省，他们这么搞，无非是用这三个人来压造反派。黄兆其接着说，商业系统的造反派因为这三个人的问题压得够呛，要帮助他们解决一下。商业系统如果在这几个人的问题上能够得到突破，斗争也可以深入一步。

下面是徐宝兴的《备忘摘记》上一九七六年八月五日、六日摘记原件（节录）的影印件

八月五日

许在民生街研究许等三人问题。
或找出三案片见
一、齐书记对他的史政委先向以他
讲过一个。
二、策略定为外松内紧。
三、具体方法：
①向中央反映情况，建议徐学惠出面。
②对刘殷农同志继续做工作，促使市委班子起作用。
③加紧对走资派的斗争。

八月六日

上午去徐学惠家，有陈文才、胡恒铿、汪多闻、丁建华。
（同）
交换了对许等三人的问题，基本思想是已上虎背，不斗不行。基本推翻昨天外松内紧的策略。徐等意见要大造舆论，定下星期一、二、三搞。
晚上黄、刘、张、T（涂晓雷）在杨（慰农）家碰头，沈（炳章）未到。
1、谈了市商情况，确定最近黄、刘找徐学惠交换意见（刘介绍了三人情况）。
2、谈了橡胶厂给曹荣华打招呼。

影印件原文

八月五日

上午在民生街研究许等三人问题。

我提出三条基本意见：

一、方针从一起解决改变为先易后难，解决一个算一个。

二、策略定为外松内紧。

三、具体方法：

①向中央反映情况，建议徐学惠出面。

②对刘殷农同志继续做工作，促使市委班子起作用。

③加紧对走资派的斗争。

八月六日

上午去徐学惠家，有陈文才、胡恒铿、汪多闻、丁建华。

交换了对许等三人的问题，基本思想是已上虎背，不斗不行。基本推翻昨天外松内紧的策略。徐等意见要大造舆论，定下星期一、二、三搞。

晚上黄、刘、张、T（涂晓雷）在杨（慰农）家碰头，沈（炳章）未到。

1、谈了市商情况，确定最近黄、刘找徐学惠交换意见（刘介绍了三人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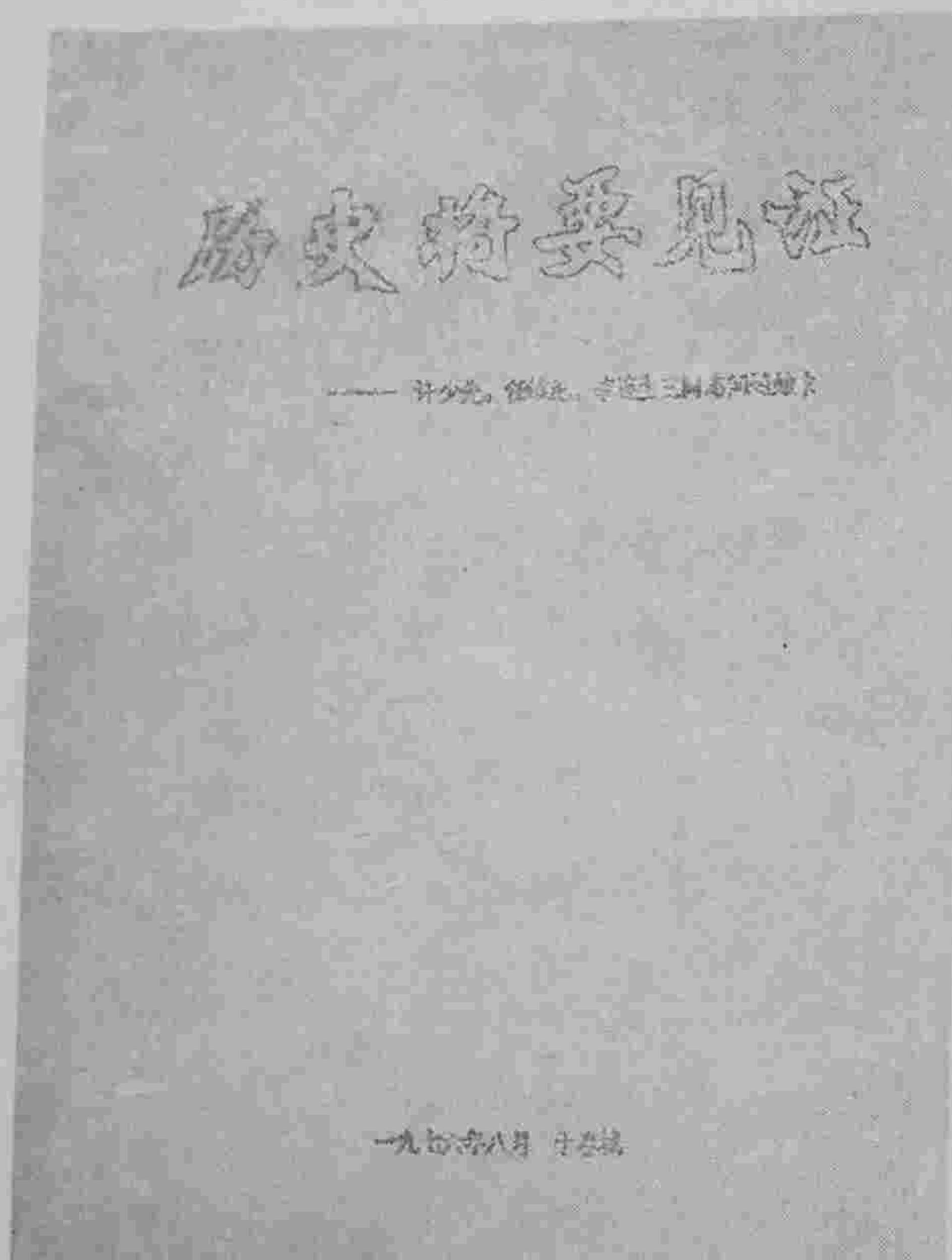
2、谈了橡胶厂给曹荣华打招呼。

下面是古安生、汪多闻的揭发交代（节录）

去年，八月八、九日，黄兆其叫我们去他家。黄说：“我始终是很关心你们商业系统的，而且，比你们还考虑的早”。又说：“地书会议时，刘殷农、徐学惠我们就交换了意见。你们系统去年是全市的重点，对造反派搞得是惨的，走资派把你们商业上作为突破口，用你们的经验推动全市，用抓人的方式来推开运动，整造反派。但是，这次运动开始后，见你们老是动不起来，我和老刘（殷农）很着急，决定派羊××给你们做工作，想把你们发动起来，你们起来很慢，错过了战机。象省建、铁路就那么几十个人，到会上找那些老头子斗他一两次，问题就解决了”。黄兆其还说：“要注意斗争策略，要学会在党委内部进行斗争”。鼓动我们“要象斗地主、斗资本家一样，来斗今

天的走资派”。最后，黄兆其说：“对许少先三个人的问题，我不会不关心的。我准备找市委主要负责人谈这个问题，从我所处的角度发挥影响作用”，等等。

下面是徐学惠等人炮制的题为《历史将要见证》反动大字报油印本的封面影印件



《历史将要见证》反动大字报的反动论点是：

(1) 把对现行反革命、流氓罪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诬蔑为是“搞翻案复辟的修正主义路线”，“反映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利益”。

(2) 诬蔑拘留许少先等是“走资派用抓人的办法推开运动，是货真价实的整造反派”，“是走资派变‘复辟希望’为‘复辟行动’”。

(3) 恶毒攻击各级党委是“四十年代还乡团行径的重演，十年前刘少奇围剿革命派纲纪的再现”。

他们的反动策略就是“针锋相对，无条件释放”。

二、强迫省委和昆明铁路局党委释放铁路局在押的十三名罪犯

1. 下面是涂崇云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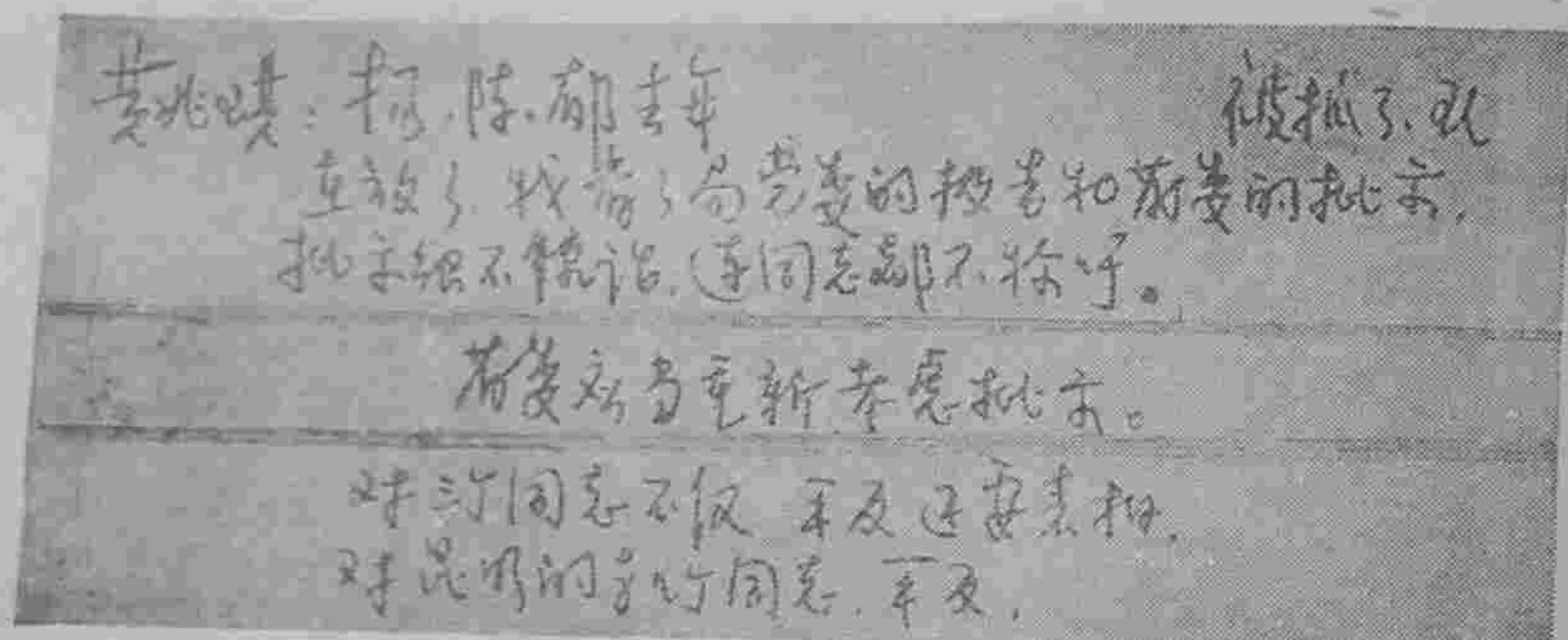
去年，昆明铁路局被迫释放了证据确凿的十三名罪犯，其中包括现行反革命五人，杀人犯四人，军统特务一人。释放这些罪犯，完全是黄兆其策划和指挥的，黄兆其胡说，这些罪犯“都是经过考验的造反派，我们就是要依靠他们”。

三月二十六日，徐洪文等把局党委常委抓到北京路招待所后，黄兆其立即窜到铁路局招待所，要铁路局党委“三天之内决定放人”。三月二十九日，铁路局党委坚持不同意释放罪犯，黄兆其又窜到北京路招待所，与徐洪文等密谈到深夜以后，于四月一日上午向局党委负责同志提出“无论如何四月二日要放人”。四月二日上午，铁路局的帮派又强行把局党委常委全部抓到北京路招待所，围攻殴打，黄兆其配合向省委施加压力，威逼省委搞了个“批示”。下午五时，朱克家、黄兆其、胡延观来到铁路局，朱克家在局党委坐镇，黄兆

其在北京路招待所监督，直到把要放的在押罪犯全部放出来后，他们才离开昆明铁路局。

2、把罪犯称为“同志”、“反潮流的英雄”，“还要表扬”

下面是易继堂一九七六年四月作的黄兆其讲话记录原件（节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黄兆其：杨（运昌）、陈（克发）、郁（仕源）去年被抓了，现在放了，我看了局党委的报告和省委的批示，批示很不像话，连同志都不称呼。省委应当重新考虑批示。
对三个同志不仅平反，还要表扬。
对昆明的另几个同志平反。

下面是张仁玮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去年四月二十日晚，郭弟元、徐洪文组织一些人向省委领导汇报昆明铁路局的情况，我也参加了。黄兆其针对被强迫释放了的十

三个在押罪犯的平反问题说：“我看可以分这样三种情况：杨运昌、陈克发、郁仕源三个人算一种，他们在去年是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是‘反潮流的英雄’，是‘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不但应该平反，而且还应该表彰，我建议《云南日报》要刊登他们的文章。一种是万帮林、徐典模几个人有错误，但把他们抓起来是错误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平反。第三种，陈宝兴等四个人的问题，由省委和铁路局组织调查后再处理”。黄兆其完全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包庇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他要表彰的杨运昌三人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平反的六人中，有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两个行凶报复犯罪分子；要调查处理的四个罪犯，则是他私自调阅罪犯卷宗，明知是杀死三条人命证据确凿的杀人犯，却蓄意包庇，说什么还要“调查”。

3、犯人出狱后，大搞篡党夺权活动，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

下面是李昌林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去年二三月，朱克家、黄兆其多次来我局，强迫释放了在押罪犯郁仕源、徐典模、刘绍祖等十三人。这些罪犯出狱后，大搞篡党夺权活动，疯狂地向广大革命群众、干部进行反攻倒算。刘绍祖回到原单位对群众张牙舞爪地狂吠：“怎么样，我这个反革命又回来了！”还对正在开会的党委成员叫喊：“你们这些‘走资派’、‘老特务’，能把我怎么样？”狂叫要“改组局党委，砸烂局党委”。徐典模释放出来后，立即召开黑会，策划篡党夺权，相互封官，不是党员的徐典模也封为昆明铁路局机车修理厂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郁仕源为首抢占了党委办公楼，抢走了大量机

密文件。

他们用钢筋焊成高帽，用揪斗、捆绑、罚跪等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老红军、局革委副主任缪春山及其他干部、群众一百三十三名。我因拒绝在释放他们的错误决定上签字，被围斗、罚跪了五个多小时。郁仕源疯狂叫嚷：“今天要象斗地主一样斗你，看你改不改悔”，抢去了我的工作笔记本，并撕去一部分。

下面是吕世瑞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去年三四月，黄兆其坐镇昆明铁路局指挥释放了我们开远分局的四名杀人犯。这伙罪犯被释放后，他们帮派组织了三十多人将其护送回开远，逼迫分局党委为陈宝兴复官复职。杀人犯陈宝兴等立即组织人员，冲击党委，大打出手，把十一名党委委员打跑了九名，其中四人被打伤，把党委领导班子搞瘫痪。随即又制造了“四·一二”武斗流血事件，搞得火车开不出，物资不能运，旅客不能行，造成米轨铁路瘫痪，交通中断，给昆明市及沿线工农业生产、市场供应、群众烧煤都造成了严重困难。

三、在全省刮起了一股释放在押罪犯的黑风

在朱、黄、刘帮派的捣乱破坏下，全省被迫释放了各种罪犯一百二十人，后果十分严重。

下面是江川县公安局的揭发材料（节录）

朱、黄、刘帮派刮起的释放在押罪犯黑风，在去年也刮到了

我们江川县。在江川县被迫释放的两名罪犯中，一个是奸污、猥亵少女多人的伪连长；一个是证据确凿的日伪汉奸、日本宪兵队的便衣特务，曾被我人民政府拘捕过，以后隐瞒历史，混入革命队伍。

六九年，这两个坏蛋乘“划线站队”之机，采用八十多种法西斯刑法，在江川制造了一个所谓“反革命农革军”假案，把大批干部、群众打成“反革命”，抓去游斗的有三千二百多人，打伤二百五十八人，打残一百一十九人，打死、逼死二十二人。直到七五年才依法逮捕归案。但是，七六年三月，江川的帮派头目与省里的徐宝兴等人相勾结，在黄兆其的支持下，又逼着把这两名罪犯释放了。他们深知这两个坏家伙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敢就地释放，以转监提审为名，秘密搞到易门县去释放。

下面是周兴华、许发英两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去年，在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释放在押罪犯的煽动下，禄丰县的帮派头目紧密配合，勾结政法机关的帮兄弟，劫监狱，放罪犯。

他们煽动犯人给县委书记、公安局长下“战书”。扬言：要夺州公安局的权，要当公安局长，要把那些“老复辟派”、“还乡团”一个一个地请他们尝尝监狱的滋味，要报仇。唆使在押犯串通监号犯人闹事，越狱逃跑。组织帮兄弟，冲击公安机关，书写反动对联。四月二十日夜，唐联学等策划指挥一伙帮兄弟，手持凶器，分乘卡车，堵住县公安局两端街口，冲入县公安局看守所，将罪犯李国荣、李清明劫走。

八月，禄丰县的帮派头目李承滇策划制造了“八·二五”打砸抢流血事件，省委决定由州公安局拘留审查，禄丰县的帮派头目则大

摆宴席为李“饯行”，戴上大红花，坐上敞蓬汽车，车上贴着“热烈欢送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李承滇奔赴新的战场”、“为革命坐牢光荣”等反动标语。到楚雄后，喊着反动口号，游行“示威”，揪斗了病倒卧床的州委书记，然后，住进了州革委招待所。后在省委一再催促下，才被迫将李承滇送进看守所，但仍不关进监号，住在小花园里，其帮兄弟经常给他送酒、肉、烟、糖，和罪犯李承滇一起打扑克，下象棋，饮酒作乐，其反革命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下面是王克敌、张琳波、孔麻盖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去年盈江县的帮派头目，强迫县委在街天释放在押罪犯，他们下令工厂停工，粮所停供，学校停课，商店停止营业；强令县有线广播站停止转播中央电台广播，由他们预先安排的有线广播喇叭播出了《红灯记》中李玉和迈步出监的唱段，逼着县委三个副书记、两个常委到狱中“迎接”他们所谓的“反修战士”，还给罪犯戴上大红花，放了四百多元钱的火炮，狂呼“向光荣的反修战士致敬”等反动口号，在十字街口举行“欢迎仪式”，并搞了录音。然后，游行“示威”，招摇过市。晚上，为“庆祝胜利”放专场电影，勒令县委全体成员到场受“教育”。次日，又专门为罪犯单独放专场电影，设宴“接风”，挥霍公款六百多元。

下面是孙精明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去年，呈贡县的帮派头目，强迫县委一次释放在押罪犯十六名。其中，杀人犯就有十三名。有的罪犯释放时自己不敢出去，说：“我的罪恶，起码也要判十五年徒刑”。这批罪犯出狱后，大搞篡党夺权活动，对审查和检举罪犯的人大肆进行打击报复。他们

强迫县委给罪犯补发工资、工分。给罪犯张棋补发了逮捕后的工资三百六十一元八角，给罪犯肖友宗补发拘留后的工资一千二百八十元。有的罪犯补发工分时，还分项列出补发在押工分、“营养”工分和家属“上访”工分。马金铺公社横冲大队杀人犯鲁海洞，补发在押工分二千六百四十分，“营养”工分二百七十五分，家属“上访”工分八百五十分，共三千七百六十五分。这个大队有两名罪犯家属到市、县委吵闹，围攻领导，就补发了“上访”工分四千二百零四分。

第五部分

“四人帮”被粉碎后 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负隅顽抗 进行垂死挣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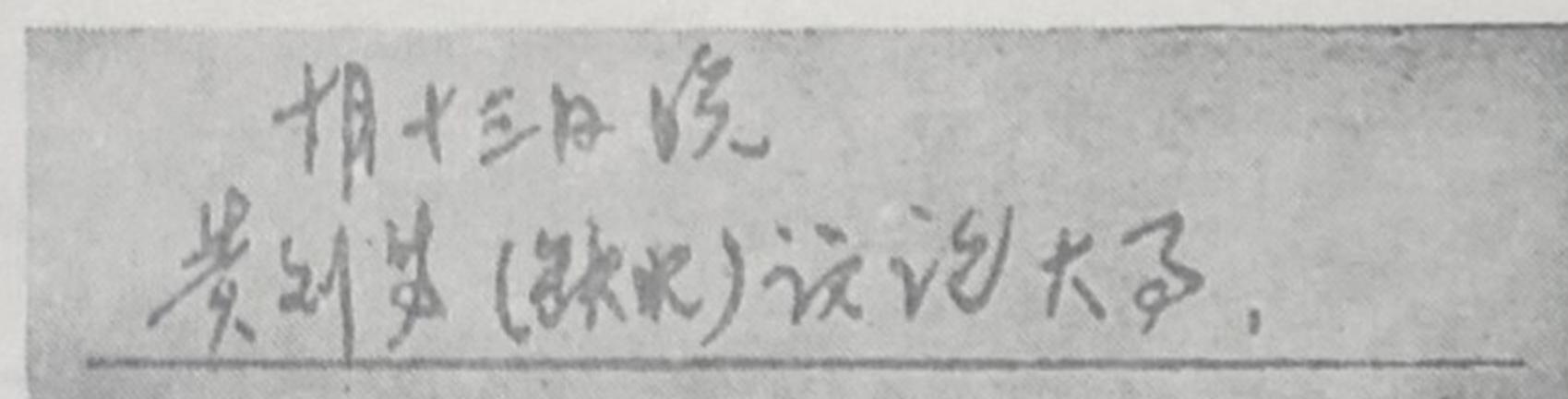
避难”，叫嚣“管他苏修、美帝、蒋帮，只要支持我们，就跟着他们干”。当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破灭后，他们仍不甘心失败，采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捏造事实、造谣惑众、反咬一口、嫁祸于人的卑劣伎俩，炮制所谓《斩断伸向云南的黑手，揭发“四人帮”罪行（提纲）》，利用多种形式，大造反革命舆论，制造混乱，转移斗争大方向。与此同时，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转移黑材料，组织帮派的第二套班子，妄图长期潜伏，伺机再起。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黄兆其一伙如丧考妣，但又贼心不死。既象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又象输红了眼的赌棍，孤注一掷。他们夜以继日，频繁串连，分析形势，密谋策划，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华主席、党中央，攻击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修正主义上台”，勾结军内少数帮派头目和骨干，以百倍增长的仇恨，密谋策划所谓“蔡锷起义”，狂叫“掉了脑袋也要干”。他们选择了叛乱“基地”，制定了控制民兵、分裂部队、“软禁”领导干部、抓捕革命群众、占领广播电台、散发反动传单和宣布什么“告人民书”的反革命行动计划。还图谋组织“地下游击队”或“上山打游击”。极少数死硬分子，则拟订了暗杀领导干部的罪恶计划，选定了叛国投敌的路线，寻求所谓“政治

一、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一次黑会

黄兆其一伙，多次召集紧急黑会，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叫嚣“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资上作好准备”。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日晚在刘殷农家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就是其中的一次。

下面是查获徐宝兴的《备忘摘记》原件（节录）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十月十三日晚

黄、刘等（缺沈）议论大事。

下面是徐宝兴的交代（节录）

十月十三日晚，在刘殷农家，开了一次串连会，黄兆其主持，并有刘殷农、涂晓雷、张奎林、徐宝兴参加。当时是在已经知道“四人帮”被粉碎但还未正式传达的背景下开的。

一、对“四人帮”被粉碎的看法

黄兆其、刘殷农认为：这是一次政变，是一次军事政变，总的是中央出了修正主

义，“保守派”，干掉了“革新派”，“右派”干掉了“左派”。这一事件后，在上面的政治代表人物一个也没有了。

二、对局势发展的三种估计

黄兆其、刘殷农认为局势发展有三种情况：

1、内战局面。中央局面稳定不了，因为“四人帮”也是有基础的，如有地方起来带头反对这种做法，特别是上海，军队再介入，内战局面就形成了。一种是以上海为中心南北对立；另一种是各地混战割据。不管怎么样，我们站在“革新派”一边干一场。

2、可能会乱。中央忙于解决上层问题，对地方失去控制和领导，地方本身又左右不了局面就可能会乱。就云南来说，如果省委左右不了形势，各派政治力量起来斗，就会乱起来，但这时关键不在地方各派政治力量，而在军队支持那一边，所以要加紧做军队工作，争取他们支持。

3、出现反复。局面很快稳定下来后，肯定要从上到下清查，对象必然是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要有充分准备。

对局势发展的三种估计，盼望出现第一种来改变局面，准备第二种制造一场混乱，担心第三种过不了关。

三、对下一步的策划

根据对局势发展的估计，总的是准备出现复杂局面，能应付各种情况，因此确定：

1、摸清情况。中央的情况，上海的情况，省里的情况，云南军队及各派政治力量的情况等。上海情况是吴福全、章健去，很快就会知道。其他方面根据各人的关系了解一下。张奎林和军内帮派了解他们的看法，张奎林和徐宝兴了解各派政治力量的情况，其他主要是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了解。

2、控制武装。出现复杂局面就要有武装，还是枪杆子出政权。“造反派”力量强，能左右形势、控制局面的地方和单位，民兵武装不能放松，要掌握住，要向下面打招呼。我直接向煤机厂，间接向楚雄、曲靖打过招呼。

3、建立基地。出现复杂局面，要有基地，作为周旋余地。这就要有一些地区和单位能控制住。这种基地要“造反派”力量强、比较稳定、和当地军队关系好，能取得军队支持。这种基地不仅在出现复杂局面，打和乱的局面需要，出现反复也需要，通过这些地区和单位坚持斗争，顶住，保存下来，对长远来说也是必要的。楚雄和曲靖是可以

的。另外还要有一些大的工矿企业，也要打招呼。我直接同煤机厂，间接同楚雄、曲靖打过招呼。

4、顶住“反复”。大家起来顶住，看能怎么样？

5、上山打游击。现在看来，形势变化出现复杂局面，打起来，乱起来，可能上山打游击，建立根据地，要有思想准备。

二、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串连活动

黄兆其一伙，按其反革命武装叛乱计划，派人赶往上海探听信息；与军内少数帮派头目和骨干勾结，密谋搞所谓“军民联合”，“蔡锷起义”；给一些地区和省、市机关的帮派头目作反革命行动部署。有几个地区的帮派头目派专人专车，日夜兼程，赶来昆明向黄、刘表示反革命决心和领取黑旨意，然后，连夜返回，敲门打户，召集帮伙，进行部署。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下面是叶秀锦的交代（节录）

七六年十月十三日上午，在龚文家开了一个酝酿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黑会。参加人有许梅康、涂晓雷、龚文、路茂钦和我。

黑会分析形势，研究怎么办？攻击中央揪出王、张、江、姚是“右派政变”、“军事政变”、“修正主义上台”。

怎么办？议论的结果，绝不当“投降派”。唯有各地乱起来，“造反派”坚决干，“革命”还有希望，个人还有出路。等到整个形势被控制了，一切都完了。在全国的思想很乱，只要一个地方起来，各地就乱起来了，关键问题是有人要带头，至少要有一个掌握军政大权有威信的带头才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海口很重要，要把武器控制起来。

议论到抓人怎么办？我说等王必成一下飞机就把他们抓起来，军内、地方就乱了。

地方好办，“造反派”去十几个人就行了，军队不好办。许梅康说，到时候可以在三大机关组织八、九个人把王必成抓起来，三大机关就瘫痪了。一定要用民兵控制制高点，卡住主要路口。民兵师也是一支重要力量，去做做工作，把制高点和要路口控制在“造反派”手里。当前主要了解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的活动，注意观察社会动向。许梅康了解昆明军区情况，龚文和路茂钦了解省委和社会动向，我到省委机关了解情况。席希圣去曲靖了解情况。

会上提出地方“造反派”应有一个怎么干的统一意见，下面才好干。涂说，不要等，可以先组织几个人，把毛主席给江青的信，用红纸正楷抄贴到近日楼去，不加按语，不落款，先把舆论造出去。

会上还提出这几天有重要情况怎么联系，我说，把龚文家作为联络点，有什么情况告诉龚文，由龚文转告。

下面是楚雄州杜勇的揭发交代（节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六日上午九点半钟，我和柯平、安且康到刘殷农家，刘殷农正同黄兆其和另外一个人在室内密谈，一小时后，刘出来叫我们进去，黄兆其对我们说：“你们准备经受一次严峻的考验吧！”黄兆其走后，刘殷农对我们说，这个打扫卫生，恐怕下一步就要打扫到我们头上了，搞不好是要彻底的搞一下的。你们州的条件好，可以在组织上、物资上有所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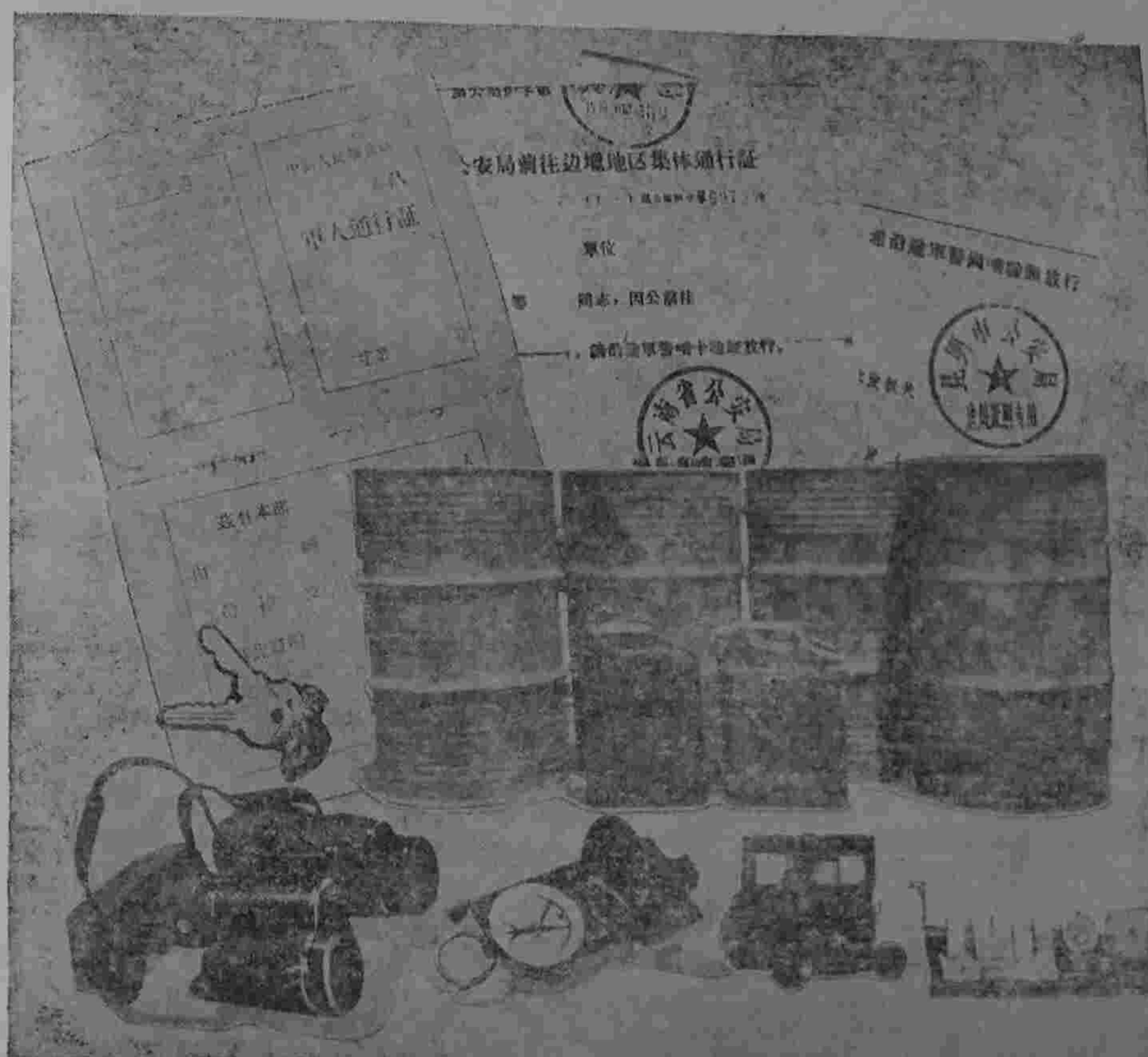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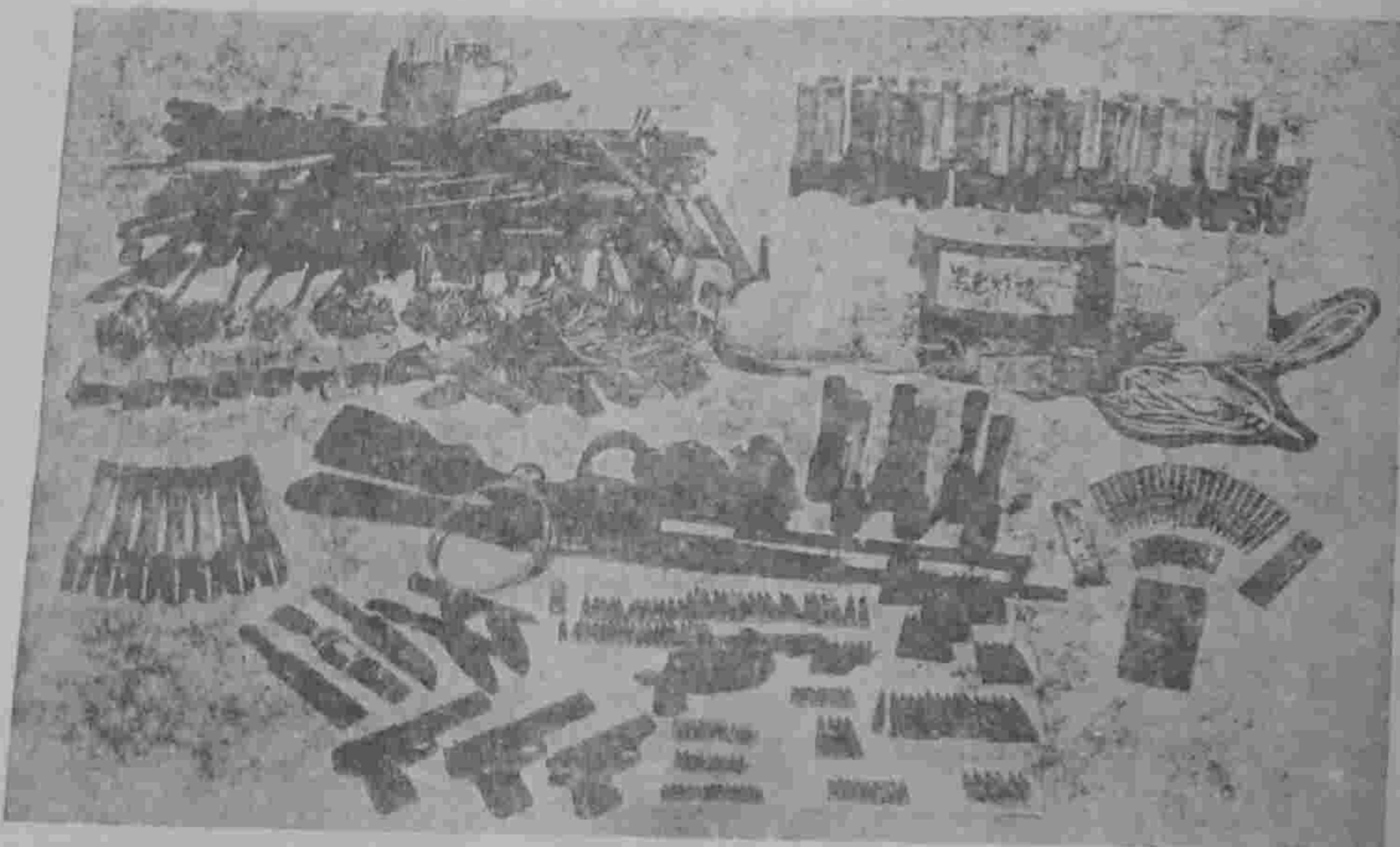
我们连夜回来后，刘光兴立即召集了吴向忠、李国梁、邱立峰、赵文炳等人在柯平家开会，柯平传达了刘殷农的谈话，研究了对策。

三、着手准备枪枝弹药和其它物资

一些地区和单位的帮派头目，按照黄、刘的黑旨意，抓了“第二武装”，还准备了枪枝弹药、军用地图、望远镜、指北针、炸药、雷管、运输工具以及战地急救药品等物资。

下面是一些地区和单位查获的朱、黄、刘帮派准备用于反革命武装叛乱准备的部分枪支弹药、雷管、炸药等实物罪证的影印件

下面是一些地区和单位查获的朱、黄、刘帮派为反革命武装叛乱准备的望远镜、指北针、电话机、汽油、军人通行证、涂改的边境集体通行证、护照以及军械仓库钥匙等实物罪证的影印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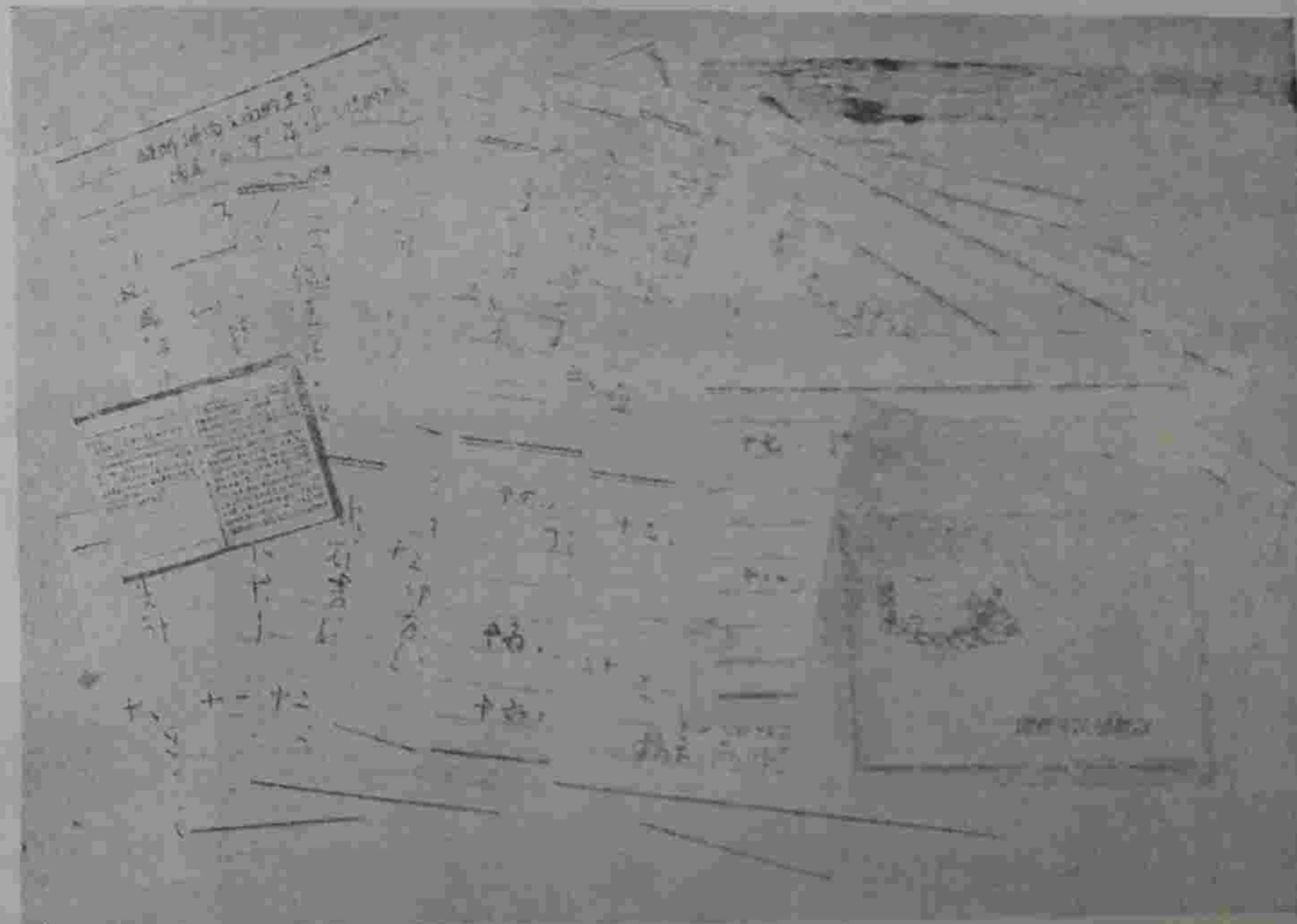
下面是查获的朱、黄、刘帮派的一个骨干准备反革命武装叛乱时用的枪支弹药、军用地图、军装、军人通行证等实物罪证的影印件



四、改变反革命策略，转移揭批“四人帮”斗争大方向

黄兆其一伙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失败后，贼心不死，躲在阴暗角落里，商讨对策，炮制黑文，张贴反动大字报，转移斗争大方向。与此同时，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转移黑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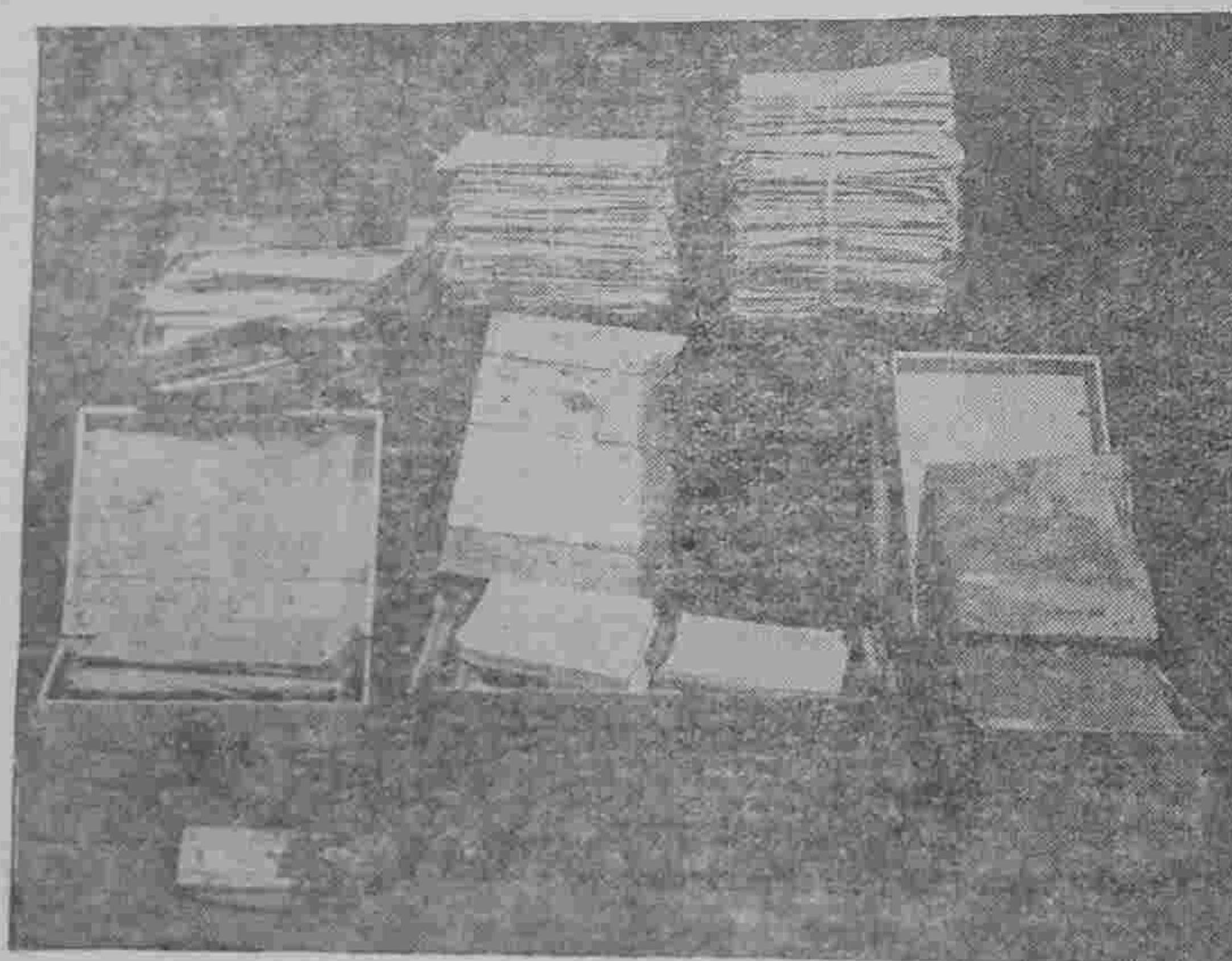
下面是省文化局、省建查获骆文心、何良泽笔记（节录）的影印件。笔记中记载有黄兆其一伙炮制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所谓《斩断伸向云南的黑手，揭发“四人帮”罪行（提纲）》二十条。



下面是查获黄兆其分散隐藏写给“四人帮”的黑报告、反军乱军以及搜集、私整诬陷省、市和地、州、县一些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共一千多份）的影印件



下面是玉溪地区查获朱、黄、刘帮派骨干分散转移的部分黑材料的影印件



下面是涂晓雷的交代（节录）

去年十月十四或十五日（注：应为十三日）晚在刘殷农家那次串连分析形势会的最后，我们统一了“材料问题各自清理，该处理的要抓紧处理”。黄兆其、刘殷农二人说：“各人的回去检查一下，以妥善为原则”。我讲，“该烧的烧掉，有价值的也可保留”。

我的材料的底稿部分，以及一些资料性的当时我想烧，但又感到可惜，我想，这些是历史的产物，留着也许还有价值，搞不好将来还要用，其实质是有“留待秋后论分晓”的思想。这样，我用塑料袋装好，决定转移。

黄兆其一伙，为了掩盖反革命罪行，一方面威胁恫吓起来揭发的革命群众，另一方面，秘密订立攻守同盟。约定：只讲现象，不讲内幕；只讲自己，不讲别人；只讲个人，不讲组织。“这次坐牢也不能讲”，“谁讲了就把责任推给谁”。

五、拼凑帮派的第二套班子，妄图潜伏下来，伺机再起

黄兆其一伙预感末日来临，急忙指挥帮派骨干，拼凑第二套班子，妄图潜伏下来，伺机再起。确定一旦朱、黄、刘被抓，即由李积德、张奎林负责，稳住阵脚，继续捣乱。

下面是刘殷农的交代（节录）

去年十月十三日晚在我家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会后黄、涂和我又研究了如黄、刘被抓，由李积德、张奎林、徐宝兴三人为主，带头干。并营救黄、刘，传达时（注：指省委传达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议精神）黄去，我托故不参加，防止二人同时被抓。并和黄约好暗号，如黄被抓，即发动人去找省委要人。

下面是吴福全的交代（节录）

七六年十二月六号左右，章健打电话通知我到何良泽家。有徐宝兴、何良泽、章健在。徐宝兴说：最近几天情况有变。老黄、老刘我们几个人商量，一旦我们几个被抓之后，你立即组织人顶上，继续出大字报，坚持斗争。我说，我担任这个角色不行，还是章健来。章说，你来吧，我们支持你当司令。我说我一个人怎么搞法？徐说：“章健继续搞联络，何良泽负责材料，你当头，再搞几个人就行了，我和老黄、老刘认为，你只有上海这件事，搞不到你头上，问题不大，你熟悉工厂工人不少，你来当头合适”。